

新视界

NEW VISION

学人访谈

拉丁美洲与全球政治经济发展 P01

学术论文

联盟类型、机制设置与联盟可靠性 P07

国关人物

薇薇·安·施密特 P24

他山之石

社会科学研究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一） P30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编者的话

夏秋之交，迎来了新一届编委会的《新视界》，即将步入一个新的时期。作为“老人”，我回首往事，虽有繁重的编辑和协调工作之余的感叹，但不变的是成功出刊每一期杂志的喜悦和对《新视界》始终如一的爱，萦绕成心头万千思绪。

首先充满心头的是感恩。《新视界》作为一份学生自主自办刊物，离不开政府学院和国际关系系的老师们的大力支持。这一份感恩看似客套，但只要实际运作过《新视界》的人，都会明白院系的支持是多么重要和不可替代。还要感谢的是一直关心支持《新视界》的老师和同学，正是你们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批评，让所有的编辑们明白编辑工作的意义、标准和改进方向，你们的无私帮助也是《新视界》的取之不尽的宝库。最后，我要感谢《新视界》的编辑们，正是你们任劳任怨的付出，才能让《新视界》一路走来，发展壮大。每次看到编辑们数易其稿，在心疼之余，我的心头总会涌起一股浓浓的暖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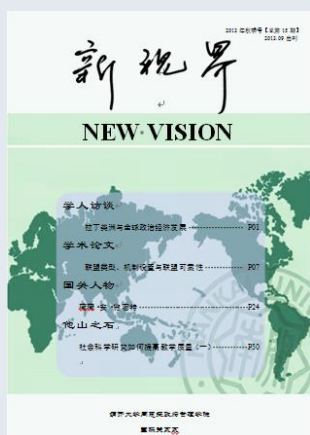
感恩之余是对于后来者的期望。《新视界》是一项神圣光荣的使命，因你的用心付出而与众不同。如果不是每一届编辑心中那一份对国际关系专业的热爱，以及将这种热爱传承下去的责任感，《新视界》不会走到今天。当今社会诱惑无限，但始终有一批人，能够坚持用心办好每一期《新视界》。相信只要能有这样一种坚守，无论《新视界》走向何方，都会不负前人，真正展现出南开国关人的品格。

编辑是一项孤独而辛苦的工作，需要责任感、严谨和主动精神。每一期《新视界》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你为它做了什么，它也会给你什么。希望每一位编辑今后能更加热忱地投入到《新视界》的工作中。这样，在离开的时候，你收获的不仅仅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一群相知的朋友，熟练的文本编辑技巧和协调能力，那时的你能够自豪地说：《新视界》，是我们的杂志。

姜忆楠

2013年9月

目 录



新视界

NEW VISION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主管
《新视界》编辑部 主办



2013 年秋季号
【总第 15 期】
2013.09 出刊

主编：姜忆楠

本期执行主编：郝丽君

副主编：曹滢 董柞壮
吕海 沈琳 孙迪

编辑部成员：

陈一一 程康 郭晓琼
李家胜 刘芮宁 刘雨晨
马焱粮 彭紫嫣 任娟
石宇 孙跃 王宝盆
王芳琳 杨雪 于凯玥
张晓康 赵姝婧 赵政
左锦涛 胡阳阳 李漩
李安琪 李冰莹 宁鹏举
裴瑶

封面设计：郝丽君 刘芮宁

编者的话..... (I)

学人访谈

拉丁美洲与全球政治经济发展..... 王翠文 (1)

学术论文

联盟类型、机制设置与联盟可靠性..... 董柞壮 (7)

国关人物

薇薇·安·施密特..... (24)

他山之石

社会科学研究如何提高教学质量 (一)

..... 加里·金、玛雅·森 (30)

英采飞扬

埃及和约旦的“阿拉伯之春”为何政治结果不同

..... 肖尧 (34)

迎新特辑

院长寄语..... 吴志成 (41)

经验分享..... 裴瑶等 (42)

学习攻略..... 郭晓琼等 (49)

班级风采..... 庞强等 (52)

国际关系专业学习入门推荐书目..... (56)

目 录

新书架 (三)	(59)
院系活动	
系内新闻	(62)
校外短讯	(64)
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67)
国际关系中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70)
国际关系英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73)
读编往来	(80)
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82)
征稿启事	(88)

刊物简介

《新视界》(季刊)于2010年6月改版创刊,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管、《新视界》编辑部主办。本刊秉承“知识性、交流性、原创性”原则(张睿壮教授语),在学院领导、教师的悉心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也得到院内外师生、校内外读者的关注与好评。

《新视界》编辑部下设编辑处、秘书处和宣传处等部门,由不同专业、年级在校学生组成。编辑部成员以“我的视界我做主”为理念,旨在以此为平台,活跃学术氛围、引导学术思辨、推动学术争鸣,为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者、学习者、关注者开启“新的视界”。

编辑部倡导“立足于南开,但又不限于南开”,热忱欢迎校内外和国内外学人、师生来稿来函,为刊物发展提供宝贵意见和强劲动力。

通讯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新视界》编辑部
(300071)

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网址:

<http://nknewvision.yolasite.com/>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nkirnewvision>

注:未获本刊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媒体不得转载本刊原创内容。

拉丁美洲与全球政治经济发展

——访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王翠文副教授

【编者按】拉美各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的舞台上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5月访问拉美三国，更是将国人的目光聚焦于这片因遥远而略显陌生的土地。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状况究竟如何，对全球经济发展又有怎样的影响？作为“金砖国家”之一的巴西是名副其实，还是空有虚名？中拉关系现状及前景如何？为此，我们对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王翠文副教授进行了一次专访，请她就上述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

【人物介绍】王翠文，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教于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研究方向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参与了《发展政治学》、《世界现代化研究（拉美卷）》等的写作，并发表论文多篇。

《新视界》：王老师能否就拉丁美洲的重要国家、地区组织或国家联盟做一简要介绍？

王翠文老师（以下简称“王”）：我们首先从拉美的整体概况谈起。“拉美地区”一般用来指称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该区有33个独立国家。拉美地区物种繁多、资源富饶，尤其是油气、矿产、水利、农牧渔业等领域。但拉美自19世纪多数国家获得独立以来，一直在探索发展的出路。为何拉美国家独立较早却始终未能走出发展的困境？一种解释认为拉美陷入了“资源诅咒”。经济自由主义认为，殖民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并以此获利。拉美国家利用资源形成了出口初级加工的资源型产品的发展模式。对此，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认为初级产品出口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不利于拉美国家的发展。

二战后，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真正得以深入展开。20世纪50至60年代，拉美推行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多数国家基本确

立其工业体系。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拉美国家的工业年均增长在8%左右，人均GDP年均增长约6.5%，拉美也成为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市场的发展、各种金融创新使得上个世纪70年代的国际资本市场极度活跃，资本充裕的外部环境鼓励了拉美国家推行借债实行“财政赤字”政策。但好景不长，到了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因为无法偿还到期外债而普遍爆发债务危机，经济发展陷入了“失去的十年”。在20世纪90年代，为了推动经济复苏，特别是为了偿还外债，拉美各国不得不接受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所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调整方案，拉美成为新自由主义改革最大的试验场。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可谓毁誉参半。一方面，拉美的高通货膨胀问题得以缓解，基本实现了宏观经济的整体稳定；另一方面，拉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再一次向资本倾斜，拉美国家内部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矛盾激化。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The*

Rerurn of Deprseion Economics) 中调侃称: 如果你对一个见多识广的国际银行家、金融官员或经济学家说“金融危机”, 他肯定会回答: “拉美”。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相继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巴西货币危机和阿根廷债务危机再次让拉美国家重新反思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

《新视界》: 拉美地区如今又取得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背后的动因是什么?

王: 近十多年, 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出现重大变化, 欧美国家爆发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 经济低迷, 发展迟滞, 西方世界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少, 影响力明显下降。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大国崛起, 东亚和拉美成为经济增长最具潜力和活力的地区, 对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

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 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其中, 尤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最为世人瞩目, “中国经济迅速增长成为过去十年间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也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 成为全球新的增长地区。中国经济的增长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 加上国际贸易条件的稳步提升, 促使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 2003 年至 2008 年间, 经济迅速增长, 出现了“繁荣的五年”, 尽管 2009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拉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较大降幅 (-1.8%), 对中国的贸易也暂时放缓, 但是从 2010 年开始, 拉美国家又开始恢复强劲的经济增长。中国和拉美地区的经济表现得受益于相互之间密切的经济贸易联系, 透过这一南-南经济联系与合作, 中拉双方实现了

互利共赢, 更重要的是, 南-南贸易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

《新视界》: 拉美有哪些有影响力的国家和国家集团?

王: 有特性且有影响力的地区性组织近年来最受关注的当属“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Community), 简称“拉共体”, 在 2011 年由拉美 33 个独立国家联合成立的、历史上第一个没有外部国家参与和影响的地区合作组织, 拉共体的成立是拉美地区合作进程中的重大事件。2011 年的“拉共体”成立大会又被称作“里约集团团结峰会”, 明确宣示了“拉共体”的宗旨是“发出拉美自己的声音”。两年来, 其首脑会议和高层次互动已达到十几次之多, 拉美国家通过联合自强摆脱美国控制的行动取得标志性的成果。

“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简称 OAS), 是西半球最早出现的地区性组织, 现有成员国 35 个, 包括除古巴之外的所有拉美国家以及北美的美国、加拿大。美洲国家组织前身是成立于 19 世纪末的“泛美联盟”, 成立于 19 世纪末, 该组织在 1948 年更名为“美洲国家组织”, 这是一个近乎囊括所有拉美国家的组织, 但长期沦为美国控制西半球国家的工具。进入新世纪, 随着拉美的“第二次独立运动”, 拉美国家在外交和内政上的自主性大大增强, 美洲国家组织在处理拉美国家事务中的作用也日渐式微。

“美洲国家组织”是美国长期主导西半球事务的集中体现, 而“伊比利亚美洲首脑会议”(Cumbre Iberoamericana) 则展示了拉美地区的欧洲传统与历史渊源。它最初是纪

念哥伦布航行500周年时由西班牙倡导成立的,由十几个拉美国家和三个伊比利亚半岛国家构成,其特点是强调拉美国家和原先的宗主国——如西班牙、葡萄牙——的联系,以及以西班牙、葡萄牙为桥梁而推动的拉美与欧洲合作的进程。目前已由常设会议发展到固定的对话和合作机制。

“南方共同市场”(South American Common Market,简称“南共市”),是南美地区最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完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共同市场,成立于1991年,成员国有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四国。南共市在降低成员国的贸易壁垒,推动投资和地区合作进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委内瑞拉于2006年成为南共市的新成员。该组织具有整合中南美洲、协调拉美事务、促进拉美国家合作的新使命。2007年南共市和“安第斯国家共同体”(Andean Community,简称“安共体”)合并为南美洲国家联盟(葡萄牙语:União Sul-Americana de Nações,西班牙语:Unión de Naciones Suramericanas,UNASUR),拟定分别于2014年和2019年前取消非敏感商品和敏感商品的关税。尽管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但在强化拉美国家政策协调和地区合作的进程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巴西是在拉美有影响力的国家,巴西的国土面积达到851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89亿,在拉美地区是总体实力最强的国家。巴西人认为,巴西始终是潜在的大国、未来的大国、明天的大国”。巴西追求成为全球性大国的雄心在卢拉执政时期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从2002年到2010年,卢拉

政府连续8年执政,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成就获得普遍赞誉。巴西的经济增长被认为可以与1968年到1973年的巴西经济奇迹相提并论。除了内政,卢拉政府高超的外交技巧和明智的战略也为巴西赢得了国际声望。卢拉政府依托南方共同市场成功抵制了美国主导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巴西在拉美地区事务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凸显。在世贸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中,巴西是积极的协调者和南南合作的重要推动者;巴西追求“入常”,呼吁安理会改革,巴西与其他的发展中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日趋上升。作为发展中国家中表现最好的经济体之一,巴西与印度、中国、俄罗斯一道被称为是“崛起的金砖”。

墨西哥是拉美第二大,以玛雅等古文明著称。墨西哥的政治制度在全球独树一帜。从1929年到2000年,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连续执政71年,虽在2000年大选中落败,但于2012年东山再起,重新执政。革命制度党成为了解墨西哥政治进程的切入口。墨西哥有句谚语,“可怜的墨西哥离美国太近,离上帝太远”。美国因素是墨西哥发展最重要的外部因素。20世纪70年代,墨西哥高举“第三世界主义”的旗帜,一度是第三世界对抗美国霸权的旗手。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美加三方走向经济一体化。进入新世纪,墨西哥外交强调面向太平洋,开始积极参与亚太区域的整合进程。由墨西哥、哥伦比亚推动“拉美-太平洋联盟”于2011年成立。2012年的《经济学人》以“墨西哥的崛起”为主题推出一组专栏文章,对墨西哥的发展前景予以肯定。

委内瑞拉人口不到 3000 万，国土面积不足 100 万平方公里，但近十多年来委内瑞拉却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明星。委内瑞拉是全球第五大石油出口国，到 2009 年石油储量为世界第二。石油是委内瑞拉的经济命脉，但该国的石油资源长期为西方力量垄断控制。直到 1999 年，查韦斯上台执政后，委内瑞拉才真正将石油这一经济资源转化为对抗强权的政治工具。查韦斯于 2001 年颁布了《石油法》，规定石油产业的国家获益从 16.66% 提高到 30% 以上，企业获利从 67.7% 下调到 50%，与外资合办的企业，国家控股须在 50% 以上，这宣告了“拉美资源民族主义”的出现。在对外政策领域，查韦斯政府高调反美，毫不留情地批判美国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委内瑞拉对内推行“21 世纪社会主义”，对外推动建立“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ianza Bolivariana para los Pueblos de Nuestra America—ALBA）。该组织是一个拉美左翼联盟组织，旨在强化左翼国家在拉美的执政地位，并通过“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 WSF）和“圣保罗论坛”（Sao Paulo Forum）等平台发出了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秩序的呼声。从 1999 年到 2013 年，查韦斯以其杰出的政治智慧为委内瑞拉赢得了超出其国力基础的声望与影响力。

智利是世界上最狭长的国家。国土狭小势必影响国内市场的规模。为了克服地理条件的局限，智利的对外经济政策呈现外向型特征。从整体来说，它的对外关税率在拉美国家中是比较低的，智利政府一直支持智利企业“走出去”。智利早于其他拉美国家率先实行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又能兼顾公平

和效率，改革富有成效，被联合国确立为“拉美经济发展的样板”。在拉美，只有智利与墨西哥成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智利的开放性和全球视野也体现其在面向亚太的政策上。在 1998 年，智利与新加坡推动了“东亚-拉美合作论坛”，这个论坛是在东亚和拉美的合作关系中唯一的官方合作机制。智利和新加坡、文莱、新西兰等国共同发起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构建，可以说在拉美国家面向亚太的战略调整中，智利是先行者，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视界》：在新兴经济体中，巴西是徒有虚名还是真正具有影响力呢？

王：最早提出金砖概念的高盛公司在近期报告中提出，新兴市场的周期性投资机会将终结。高盛公司判定金砖国家降温，主要源于中国、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速度放缓。对巴西国内经济发展的预测显示，巴西经济在 2013 年的增幅只有 2%，今年 6 月份巴西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示威活动，关于巴西的发展前景出现了不同看法。巴西这块崛起的金砖是否正在褪色？或者说巴西只是徒有其表的空心砖？

目前，巴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发展速度放缓，但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新兴经济体整体崛起的大势。具体就巴西而言，在这次社会动荡中，中产阶级成为表达社会不满的主体，中产阶层对过去十年政府社会过于优惠低收入群体而相对忽视中产阶级的收入分配政策心怀不满，大规模游行示威反对的并不是政府，也不是巴西的发展模式和经济政策。在 2007 年，巴西南沿海发现了一个大的油气田，有预测说巴西未来可以位居

十大产油国之列。这对于巴西未来的发展是个重要助力。巴西崛起的物质基础是成熟的工业体系和独特的资源禀赋以及得当的发展政策。

《新视界》：近几年，拉美政权出现了“集体左转”的情况，王老师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因为它们自身实力的上升和美欧实力的下降导致出现了这种现象呢？

王：拉美政权的“集体左转”，根本上还是内因驱动。20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让拉美国家普遍失望，拉美国家关于发展的预期落空，同时，经济出现了结构性问题，贫困率、失业率上升，拉美国家在90年代的全球经济体系中竞争力进一步受到抑制，国内的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外部风险性增加。此后，拉美国家开始反思自己的经济道路，重新寻找发展方向，在这样背景下，左翼力量整体崛起。左翼力量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把社会公正找回来，卢拉政府在巴西推动的“零饥饿”计划，就是一个减贫计划；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也是强调社会公平的价值目标，照顾低收入群体的社会需求和基本福利。拉美国家出现集体左转，事实上是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矫正和反制。

《新视界》：拉美国家对美国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

王：美国因素始终是拉美发展最为重要的外部因素。自19世纪20年代美国提出“门罗宣言”，向世界宣布了“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之后，防范外部势力染指美洲事务就是美国对拉美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二战后，美国对拉美国家的政治经济控制、军事干涉以及文化价值观的输出形成了等级化

的秩序安排。在历史上，美国对拉美国家很少以平等之心相待。一部美拉关系史也可以说是拉美国家寻求独立于美国控制、追求自主性的历史。美国对拉美的轻视与控制导致拉美历史上多次出现大规模的反美主义思潮，拉美成为全球反美主义的策源地之一。在另一方面，作为后发国家，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创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产品市场的开拓都需要美国的支持。战后50年代到70年代，拉美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唯美国马首是瞻，被称为“有外交而没有外交政策”。这种依附性合作的外交选择在冷战结束后再度成为拉美国家外交的主流。冷战结束后，即使是像阿根廷这样素有反美传统的拉美大国都转向了追随美国。时至今日，随着国际政治体系的转型，美国实力和影响力再度衰退，拉美国家掀起了“第二次独立运动”，拉美左翼联盟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攻讦不绝于耳，拉美与美国的关系始终在冲突与合作两条主线中交替演进。

《新视界》：拉美在中国外交中处于何种地位？

王：中国与拉美大多数国家的建交是在20世纪70年代，对中国外交来说拉美是起步最晚、难度最大、历时最长的地区。在新世纪之前，无论是在中国的贸易体系还是外交战略的布局中，拉美都是外围地带。对于拉美来说，中国也还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家，双方关系基础薄弱、先天不足。由于地域遥远，中拉人员、商贸往来极为有限。在2000年之后，双方关系产生了跨越式发展。在2000年前，中拉贸易额不足100亿美元，2000年达到126亿美元，2011年就突破了2000亿美元。据估算，在未来5年中，中拉

贸易额能突破 4000 亿美元。在投资方面，2003 年的中国对拉美投资仅为 10.04 亿美元，到 2010 年达到 104 亿美元，增幅达到 10 倍之多。中拉关系在 10 年中实现巨大突破，实现了持续性、跨越式发展。中拉之间除了贸易和投资的大发展外，在金融领域的格局变化上也极为显著。目前中国对拉美的融资规模已超过了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的融资总额，来自中国的资本和信贷成为拉美信贷的重要来源，可以说，中国成为拉美经济体系中重要的影响力量。在美欧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之后，在拉美地区，中国成为平衡欧美影响的重要行为体。新世纪以来，中拉关系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004 年胡锦涛主席的四国之行（巴西、阿根廷、智利、古巴）形成了中拉关系的第一个高潮。2008 年中国发布了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政策文件，拉美成为中国对外投资、海外投资的重要目标地区。第三个高潮是在 2013 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拉美的三国之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习主席提出“要把合作的蛋糕做大”，中拉关系处于进一步发展的机遇期。在中国的外交布局中，拉美的地位呈上升趋势。

历经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中拉关系也处

于一个新的转型期。中拉关系的发展集中在中国和几个特定国家之间，如贸易和投资往来集中在阿根廷、巴西、秘鲁、智利和墨西哥几个拉美大国中，这就出现了中拉关系在国家层次上的不平衡，这说明：中国对拉美的关系还是以资源和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关系。中国外交被西方国家和个别拉美国家描述为新殖民主义，拉美将陷入新的依附，这都是不利于中拉关系良性因素。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墨西哥的演讲中反复提到中国不追求贸易顺差。目前，拉美有两种政治力量，一种是希望强化与中国的关系，一种是用贸易保护主义来对抗中国的竞争优势。在下一个阶段，中国会扩展经贸往来的范围，更多和有特色的国家拓展关系，如哥斯达黎加，被西方国家称为“民主的橱窗”，政局稳定，经济基础良好。哥斯达黎加作为中国的新朋友，双边关系在这几年的发展势头非常之快，在下一个阶段，中国与它的合作会进一步深化。这样的国家还有巴拿马、哥伦比亚等，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很有前景。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的均衡发展，符合中拉双方的利益和需求。

[整理：吕海、赵姝婧、彭紫嫣、郭晓琼、宁鹏举、裴遥]

[责任编辑：刘芮宁]

联盟类型、机制设置与联盟可靠性

董柞壮*

内容摘要: 现有对联盟设计与联盟可靠性的研究并没有充分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联盟的形成、管理、维持和瓦解的过程中, 每一个阶段的变化都反映出国家对成本与收益的分析。该过程包括三个方面: 成本与收益的核算、成本与收益的分配和降低成本的努力。然而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对成本与收益的核算, 对另外两个方面关注较少。本文从联盟的两个功能——威慑与援助角度出发, 认为联盟的可靠性来源于两个方面: 威慑对手与援助盟友。联盟机制对这两方面发挥作用, 对盟友主要是通过复杂的机制提高背叛成本, 对于对手则是发出有代价的信号威慑其冒险行为。通过经验研究和案例分析发现, 尽管国家设置更高水平联盟机制的目的在于提高联盟的可靠性, 但是由于国家在联盟中成本与收益分担不同、降低成本的努力不同, 因此联盟机制的设置对联盟可靠性的影响是复杂且有条件的。

关键词: 联盟类型; 机制设置; 成本与收益; 联盟可靠性

在国际政治中, 联盟的主要作用是提供额外的安全, 包括有效威慑对手和有效维持联盟承诺。从联盟安全功能的角度来考察联盟可以发现, 联盟的核心在于可靠性而非持久性。在联盟层面上, 与联盟可靠性直接相关的是联盟的设计。国家会通过联盟条约设定不同程度的军事合作机制, 以达到提高联盟可靠性的目的。本文认为, 联盟的设计在特定条件下对联盟的可靠性发挥作用, 本研究的问题是联盟的机制设计和联盟的类型如何影响联盟的可靠性。

在理论上, 米谢拉·马特斯 (Michaela Mattes) 最新的研究发现, 在实力对比存在差异的联盟内部, 成员国出于提高联盟可靠性的考虑, 会设置相应的联盟机制。^①但是, 高度机制化的军事合作却并不一定带来更高的联盟可靠性。布雷特·阿什利·利兹 (Brett Ashley Leeds) 和塞兹·安纳奇 (Sezi Anac) 的研究认为, 联盟的机制化程度与联盟的可靠性之间并没有显著的联系。^②在现实中, 美国在东亚保持了高度机制化的联盟体系, 中国周边的领土争端也多与美国的盟友有关, 理解其联盟发挥作用的条件有助于中国适当应对周边争端。此外, 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与他国的合作, 在与其他国合作时采取更为可靠的合作形式也值得学界关注。

本文将采用定量研究与案例研究结合的方法来探讨联盟类型、联盟设计与联盟可靠性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第一部分将提出研究的问题; 第二部分对现有文献进行回顾和评析; 第二部分从理论上探讨联盟设计与联盟可靠性的关系; 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 在对变量进行操作化基础上设定 Logit 模型; 第四部分分析经验结果, 并利用案例进行验证; 最后是结论, 同时将揭示本研究的政策启示。

* 董柞壮, 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3 级硕士研究生。

① Michaela Mattes, "Reputation, Symmetry, and Alliance Desig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6, No. 4, 2012, pp. 679-707.

② Brett Ashley Leeds and Sezi Anac, "Allianc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Alliance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31, No. 3, 2005, pp. 183-202.

程中,由于成员国实力对比和成员国属性导致的利益和成本分配会发挥显著的影响,降低联盟维持成本的联盟设置也会发挥积极的影响。

非对称的联盟军事合作程度越高,反而会使得联盟成员国更容易被攻击,也更容易被抛弃。民主国家更容易维持联盟,但是其威慑效果却更差。另一方面,非对称联盟成员国目标越相似,联盟更可靠。在非对称联盟中,大国更容易被攻击,但是不一定更容易被抛弃。成员国经历过战争更容易导致联盟被抛弃。

在现实中,中国与他国的军事合作水平不仅要考虑使之能够发挥作用,还要考虑对手的反应。在盟友的缺乏可能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选择何种盟友、进行怎样的军事合作更有利。如果进行较高水平的军事合作,对外政策目标相似的国家是可行的选择。正如美国在东亚保持高度机制化的联盟体系,但是官方并未明确表态针对中国。同时,尽管美国的联盟体系对中国造成了安全压力,但是与美国目标存在分歧的盟友未必会获得美国始终的支持,中国可以以这些国家为突破,分化美国的联盟体系。

[整理:陈一一、左锦涛、郝丽君]

[责任编辑:郝丽君]

· · · · · · 论文助手 · · · · · ·

“战争相关指数”数据库 (Correlates of War, COW)

建立“战争相关指数”数据库 (Correlates of War, 简称 COW) 的目的是使国际关系中准确可靠的定量数据的收集、扩散和使用变得更加便利。COW 数据库的关键原则包括对复制、数据可靠性、数据整理、回顾以及数据收集过程的透明性的标准科学原则的严格遵守。每隔一段时间 COW 的运营团队就发布一次数据,该数据库的数据主要包括“非国家战争数据 (Non-State War Data)”、“国家间战争数据 (Inter-state War Data)”、“超国家战争数据 (Extra-State War Data)”、“国内战争数据 (Intra-State War Data)”以及其他多种与战争相关的数据库。COW 数据库的网址是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整理:姜忆楠、吕海、王宝盆]

[责任编辑:姜忆楠]

薇薇·安·施密特

【编者按】在当今众多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中，欧盟无疑是其中的典范。有一批学者长期关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薇薇·安·施密特教授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摘取、总结了施密特教授对于欧洲一体化和欧洲政治经济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大家。

学者简介

薇薇·安·施密特 (Vivien Ann Schmidt)，现任波士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让·莫内欧洲一体化研究学者、欧洲研究中心创会理事，曾任美国欧盟研究协会会长。

1971年，施密特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布林莫尔学院，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后于1973年在芝加哥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1973年至1974年，施密特在巴黎的政策研究学会 (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学习。1981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

1981年起，施密特任教于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校区，历任民主与发展中心主任、麦科马克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94-1998)和欧洲研究项目主任(1993-1998)，并任政治学与管理学教授 (1993-1998)。1998年，

施密特受聘任教于波士顿大学，教授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除此之外，施密特还曾任教于一些欧洲的教学科研机构，如维也纳进修学院、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所、科隆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巴黎大学和里尔大学，并曾在纽菲尔德学院、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

施密特的研究兴趣集中于欧洲政治经济学、制度、欧洲民主和一体化，出版了十余本专著、百余篇论文和大量政策摘要及评论，最近施密特持续关注欧元区的危机。目前她担任巴黎政治学院、柏林自由大学、剑桥大学和哥本哈根商学院等欧洲教学科研机构的客座教授。

施密特的著作颇丰，著有《欧洲资本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s of European Capi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欧洲的政策变化和话语》(Policy Change and Discourse in Europe, co-edited with Claudio Radaelli, London: Routledge, 2005)，《欧洲的民主：欧盟和国家政治》(Democracy in Europe: The EU and 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争论中的欧盟政治认同及其合法性》(Debating Political Identity and Legitima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co-edited with Furio Cerutti and Sonia Lucarelli, London: Routledge, 2011)。



一、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衰变化

（一）资本主义国家作用的兴衰变化

最近 30 年来，在欧洲政治经济生活中，国家的作用经历了跌宕起伏。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之前，国家处于中心地位，随后作为研究对象淡出人们的视野，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国家作用一度复苏，随后又走向衰落。这种情况不仅与全球化和欧洲化造成的重大变化有关，也是“新制度主义”兴起的必然结果。

施密特认为，在一个日益欧洲化的地区和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变化导致人们低估国家的作用。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国家一手导演了自己的退却，放弃了本可保障其自主性的各种政策工具。在宏观经济领域，国家转向了货币主义；在微观领域，国家取消了管制，实行了私有化和自由化；在超国家领域，国家建立了国际性和地区性贸易组织。以法国为代表的国家指导型的国家完成了转型任务，用“国家干预”(dirigiste)终结了“国家统制”(dirigisme)。然而，国家的退出并不意味着国家作用的终结。因为取消管制并不意味着结束管制，而是采取另一种不同的管制。但是，从国家行动向独立的公共行动的转变却提醒学者们时刻要注意这一点：国家至多不过是市场的规制者，这就使国家不再是资本主义舞台上的主角。

施密特指出，本世纪之初时，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正在独领风骚，全世界和欧洲的许多国家都在效仿美国和英国的成功经验，纷纷对金融市场实施自由化政策、放松对企业的管制政策、放宽对劳工市场的限制政策。那些传统上劳资关系协调和国家影响较普遍的欧洲国家，正在承受着福利国家成本、过度管制的劳工力量和过度干预的国家力量造成的沉重负担，它们被认为是市场与效率之战中的失败者。当时，许多人都曾预言过它们的衰亡。

然而自从 2008 年金融市场崩溃和随后的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优越性遭到人们的质疑。那些从慷慨的福利国家政策中获得“自动稳定器”的国家能够更好地抑制失业的增加，也能更有效地减缓危机给劳动人口和穷人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些劳资关系组织程度高的国家能够更有效地通过协商方式改变工资和工作条件，那些国家干预更普遍的国家则能在全国范围更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以应对危机^①。这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国家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二）资本主义国家的多种模式

全球化与欧洲化的力量既没有带来 20 世纪 90 年代初许多学者所断言的那种情况，即资本主义正在向新自由主义模式趋同；同样，也不像其他学者在 21 世纪初所断言的那样，资本主义继续以自由市场经济和调控市场经济两种形态存在。至少，欧洲历史上形成的三种资本主义形态仍然存在，构成第三种形态的是国家增强资本主义，它既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也不同于管制资本主义，施密特教授将其称为“国家影响”的市场经济(SMEs)。在典型的

^① 施密特认为，美国对危机的迅速反应能力并非全来自其资本主义模式，而是来自其独具的特征，其中包括美国的全球经济领袖的地位，以及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工具的地位——这使美国能够继续从全球各地吸引大量的投资。

国家影响的市场经济国家内，国家不仅在战后时期，而且在今日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国家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有所减弱，但它对企业和劳工仍保持着重要的影响。在国家影响的市场经济内，不管怎样，国家的干预较自由市场经济(LMEs)和调控市场经济(CMEs)更为普遍，方式也更不同；同时，企业与劳工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不同，尽管企业和劳工面临的全球化和欧洲化带来的体制调整和经济调整压力是相同的。

哪些国家符合这三种形态呢？施密特教授主要分析了欧洲的三个典型案例：即英国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德国代表的管制市场经济和法国代表的国家影响市场经济。

自由市场经济当然存在，但在数量上没有那么多。它们主要包括英语国家，实际上，只有美国、英国——某种程度上还有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属于这种情况。调控市场经济国家的数量要稍微多一些，但也不那么多。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欧洲，包括德国以及荷兰、丹麦、奥地利、瑞典和瑞士这样的欧洲小国，而在亚洲，可能只有日本。

相比之下，世界各地都存在着国家影响市场经济国家，在欧洲主要是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东欧一些国家，亚洲国家中包括韩国，还包括拉美一些国家。

重要的是，将资本主义模式分为两种形态的方法与将资本主义模式分为三种形态的观点并没有多少矛盾（除了前者坚持只存在两种资本主义外），因为被归入国家影响的市场经济范畴的国家恰恰就是那些不符合自由市场经济和调控市场经济两种模式要求的国家。

（三）国家作用的制度分析框架

施密特教授认为，传统的方法常常低估（如果不是忽视的话）国家作为关键主体的重要性。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认为国家仅仅规范着政治经济制度路径依赖的一些规则和规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认为国家仅仅制约着政治经济主体理性选择的激励结构。在《欧洲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施密特采用了另一种方法论，即话语推论制度主义，它的重点放在公共话语的思想的本质内容和互动过程方面，认为通过这种公共话语，政治主体能对公共行动进行探讨、协调和沟通。

目前，发达工业国家的政府普遍加强干预，特别是从对金融机构国有化方面看，因此，将国家作用重新纳入政治经济分析的时机很适宜。然而，这种无处不在的新国家干预主义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所有国家都在为稳定金融市场而进行深度干预（通过放任政策）的时候，资本主义各种形态之间的差异还重要吗？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各国采取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背后的思想和公共话语，那么，我们会发现差别依然明显存在。

英国自由市场经济和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最突出的对比。美国一度迟迟不动，听凭莱曼兄弟破产，众议院强烈抵制“金融社会主义”，然后才采取与英国自由市场经济同样的措施，开始股权收购。英国自由市场经济比美国能够采取更好的行动，这不仅是因为英国的政治制度因素，而且也是因为英国执政党理念上的差异（“新工党”对布什的白宫），以及深深根植于历史传统的对国家的态度（在英国，国家在有限领域中的强势地位有更多法理基础的支持）。

法国的国家影响市场经济比英语国家的模式走得更远,它努力实现了欧元区在协调上的共识、提出了全球多边干预的建议、实行了更多的内部干预(在欧盟委员会的控制下)。在德国,情况非常有趣,国家也进行了干预,但较法国国家影响市场经济和英国自语市场经济内的干预速度更慢也更谨慎。在施密特教授看来,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多种类型时,将分析的重点放在思想和公共话语的规范作用的话语推论制度主义(DI)分析方法可能是有用的。

二、欧洲一体化研究的新变化

关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理论,学术界主要关注四个问题:一是在一体化进程中成员国如何建立合作?二是如何概括欧盟超国家机制的特征,它们与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三是欧盟超国家机制自身如何通过欧洲化进程影响成员国的制度?四是欧盟政策如何通过相同的欧洲化进程改变成员国的政策?前两个问题涉及欧盟层级上欧盟与成员国的相互关系,后两个问题是关于它们在国家层面的相互关系。

(一) 关于欧洲一体化动力的问题

施密特认为,关于欧洲一体化动力的争论日益变成空洞的学术争论。如果认真思考欧盟的历史,就能清楚认识到:若发生创新性变革,成员国必须发挥领导作用,尽管欧盟制度行为体普遍发挥“幕后作用”。但是在日常政策制定方面,国家与各个层面及类型的社会行为体都参与进来,不可能精确指出某种行为体是委托主体,无论是成员国还是欧盟。如今最重要的是,在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运用领导能力变得十分复杂,争论谁是欧盟一体化的动力已毫无意义。施密特指出,这就是为什么学术关注从欧盟动力转向其制度设计的自然与必要原因。

(二) 关于欧盟的机制与“民主赤字”问题

欧盟是什么?它对欧洲民主有怎样的影响?由于欧盟不断成长为世界主要行为体及日益对多种事务和广泛领域(包括共同货币、单一市场、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用一个声音说话、一个竞争权威、环境保护政策、工人安全与健康、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甚至共同防务政策的开始)拥有管辖权的区域治理形式,制度设计成为学术讨论的前沿问题。

施密特认为,欧盟应被定义为以共享的主权、易变的边界、复合的认同、混合的治理以及破碎的民主为特征的“区域国家”,联盟及其成员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可确保区域一体化持续发展和国家差异长久存在。

施密特认为欧盟与民族国家相比,有如下区别:

第一,民族国家定义为不可分割的主权,欧盟成员国在一体化过程中则共享主权;

第二,民族国家都有固定的边界,欧盟的边界根据领土和政策不断变化;

第三,民族国家倾向于拥有共同的认同,而欧盟是复合的;

第四,民族国家建立了政府,欧盟则有“治理”,这意味着通过多种权威在与国家一级社会行为体相互关系复杂的背景下,“没有政府的治理”这一治理形式使得成员国政府在与欧盟

相关的政策领域成为欧盟治理的一部分；

第五，民主国家有粘性民主，欧盟的民主是分散的，合法性分裂成欧盟层面人民管理的有效性与人民协商利益，国家层面人民政治参与和公民代表。

许多学者认为解决欧盟层面制度发展过程中“民主赤字”问题的主要方法是参与性的和代表性的。施密特则认为，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考虑到缺乏集体意愿与认同或者共同的政治空间，建立欧洲政府从目前来看根本不可能。制度设计用来回应人们政治输入要求的难题。例如，欧盟决策制定体系通过建立市场使得“消极一体化”更加容易，然而却使通过“积极一体化”导致市场变得极其艰难，因为这要求所有成员国达成一致。

施密特指出，向欧盟引入更多政治作为对民主赤字的补救是很困难的。这不仅因为它可能破坏欧盟良好运作的部分，即为人民管理和与人民一起管理；还因为欧盟根本没有真正的政治，至少没有像国家层面那样的政治。欧盟有更多以利益为基础的政策，无论是理事会的国家利益政治、欧洲议会的公共利益政治，还是欧盟委员会的组织利益政治，而非拥有所谓的政治竞争、参与和政党政治等典型的国家政治形式。这导致欧盟层面“没有政治的政策”和国家层面“没有政策的政治”的出现。

（三）国家政体的“欧洲化”

欧盟对国家政体的影响是什么？即与联邦体系最为相似的制度结构、最接近美国多元主义体系的政策制定过程、没有像国家体系一样的代表政治，欧盟高度复合的治理体系对成员国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① 欧盟对国家制度结构的影响

由于决策制定权让渡给欧盟，国家行政权力不仅仅失去自主权，还失去了一些控制权，即国家权力减弱是由于权力内部转移、欧盟多层级治理以及独立调解机构向外扩展。

相对于行政机构而言，国家议会是明确丧失权力的唯一国家制度行为体，因为行政部门在国家立法机构不能插手理事会作决策。但更为重要的是，国家议会总体上将权力让渡给欧盟，由于欧盟掌握了动议和批准权，这些权力原来都是国家立法机构的权力范围。

欧洲法院代表了欧盟超国家权力，不仅对国家行政与立法权还对司法权造成侵犯。然而，欧洲法院同时从属于国家司法权力机构，它确实增强了国家法院对国家行政机关的独立权，通过依靠欧洲法院，低级法院从等级体制中解放出来。

② 欧盟对国家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

欧盟授权对成员国政策制定过程强加改变的领域有直接影响，就像欧盟授权多元主义协商或在环境政策领域合法执行。他们在与欧盟相关的学习经历或暗示规则导致新观念传播的领域具有分散影响，这与再就业和社会保险政策领域游说或者公开协调的方法相似。但是在欧盟政策作为国家或社会行为体打破政策制定规则动力的领域，如农业政策、与银行业、电力和运输相关的竞争政策，它们可能发挥“撞击”作用。

③ 欧盟对国家政策的影响

在欧盟层面，国家政党政治被边缘化了，因为政党的差别以及左右翼政治联盟已经被以欧盟利益为基础的政治妥协与意志的广泛需求所淹没。在国家层面，由于欧盟从国家政治领域剥夺了越来越多的政策权力，没有政策的政治结果产生许多直接、间接和撞击的效果。

④ 概述

施密特指出，欧盟作为高度复合的政体，其欧洲化的自上而下影响对简单政体（如英国、法国）产生消极影响，而对复合政体（如德国、意大利）产生积极影响。但在欧洲一体化自下而上进程中却恰恰相反，制度不相配印证了单一政体比复合政体更能够在欧盟层面发挥它们的偏好。

施密特同时指出，尽管制度逻辑有助于建立民主的原则，但其他政治、社会和经济价值也发挥作用，更不用说政治、社会或经济利益。尽管欧盟的存在与法国关于“单一的个人”共和国观念相矛盾，但强调国家伟大与人民普遍权利以及领导欧盟的政治利益等法国的政治价值观念使其接受欧洲一体化。此外，尽管欧盟不仅与英国“议会主权”的制度观念相冲突，还与其强调英国人历史权利和经济利益的政治价值相矛盾。

（四）国家政策的欧洲化

施密特认为，尝试概括国家政策的欧洲化比政体的欧洲化更加复杂。尽管“适合”政策传统问题是欧洲化文献强调的关键因素之一，但无论讨论“不适合”、“不匹配”还是“适合度”，都仅仅是研究的起点。首先，着重关注形成欧盟政策的决策规定——无论是对某些政策施加影响的特定规则（如筹建欧洲货币联盟预备阶段的马约规定），还是允许欧盟政策变化留有余地的不确定规则（如通信或电力部门撤销管制规定），抑或潜在规则（如公开协调方法），或者根本没有规则（如竞争总司仅仅要求开放竞争），以及其他具体因素都会影响国家的反应。当与政策传统相“符合”或者“不符合”的情况出现时，由政策偏好判断“不符合”的情况究竟是机遇还是难题，政治制度能力反映出国家和社会行为体能否有效应对这些机会或挑战，而术语恰能通过改变人们对传统的认知或者影响偏好的方式提高政治制度能力。结果在一些部门，欧盟和国家政策的互动影响是重要的，体现了国家实践的变迁，而在其他部门，欧盟可能只有较小的影响力或只能进行与欧盟相关变化的国家实践活动，由于国家实践体现了欧盟的惯性，欧盟在某些领域基本没有影响力。

[整理：王芳琳、李 漩、孙 迪、石 宇]

[责任编辑：左锦涛]

社会科学研究如何提高教学质量 (一)

加里·金、玛雅·森*

摘要: 本文将归纳有关人类行为和社会科学研究经验的发现, 以及如何以之来提高当前的教学和学习水平。这些经验可以被简单地阐述为三条社会科学原则: (1) 采用社会联系促进法, (2) 教学相长, (3) 及时反馈以完善学习。我们将展示如何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将以上原则贯彻于大学课堂。结合笔者教学中创新的经验, 本文将给出具体案例进行说明。

几千年来, 人类总结出了如何教育的理论, 并且几乎每年我们都会更新所教授的内容。然而, 课堂上的程序和教育方式历经几代人并未取得重大进步。如果你的“高曾祖”上过大学, 他们可能也和其他同学一样坐在教室里面朝前方, 试图看起来在认真听课, 而教授在前面讲课。如果你现在是一名大学教授, 你可能要面对同样规模的学生进行授课, 而他们都在试图表现出聚精会神的样子。当然, 你可能会运用更新颖的教育技术(比如电子设备, 收音机, 电视, 白板或者 PPT), 你也可能会增加一些小组活动, 或者通过组织许多讨论来上研讨课。但如果你的祖先们走进今天的课堂, 他们会很自然地明白自己应该坐在哪里, 做什么和怎么去做。我们的教学方法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教育研究者们, 通常是在学校教育领域的研究者们, 已经撰写了很多关于提高改善教学质量的著作。其中许多观点都非常有前景, 但是只有极少数建立在严谨的经验研究基础之上, 这种状况在各个领域都会出现。问题并不出在这些研究者身上, 而是在于在该领域进行研究总会面临独特的困难。从方法论上讲, 我们有大量的学生, 但是教学干预的分析单元一直是教授或者班级。因此, 任何一个教授的课堂干预就是个 $n=1$ (样本量为 1) 的研究。尽管在自己的课堂里进行教学干预很容易, 但是想获得包含正确分析单元的合理的样本量就几乎不可能了, 也很少有人会做到: 想象一下向你的大约 50 个同事解释, 他们和他们的学生将会被随机或者以其他方式分配到实验组和对照组来验证你的假设, 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举一个例子, 为研究一个重要性堪比班级规模的变量的效应, 对其进行 75 年的教育学研究中, 只有一次是完全的随机大样本研究!

我们需要在教育领域寻找更多的机会进行这类研究。但是即使还没有这类研究, 一些实质性的进步还是很有可能的, 这是由于其他领域研究的发展——那些领域有大规模样本可以随机试验, 并且许多其他类型严谨的研究设计可以实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意味着我们对人类的思考和学习更加了解, 我们将展示, 这些进展能够被归纳来促进我们的教学。此外, 科技的进步已经远远高出当前大多数课堂中所应用的水平。尽管没有一项技术其本身的

* 本文原载于《政治科学与政治学》杂志 2013 年 7 月号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46, No. 3, 2013, pp. 621-629), 本栏目编译了前半部分, 后半部分将在 2013 年冬季号上登载。加里·金 (Gary King), 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魏斯赫得三世学院教授 (Albert J. Weatherhead III University Professor) 和定量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主任。他的主页地址 <http://gking.harvard.edu>, 他的邮箱是 king@harvard.edu。玛雅·森 (Maya Sen), 罗彻斯特大学政治学的助理教授。她的主页地址是 <http://mayasen.org>, 她的邮箱是 mсен@ur.rochester.edu。

使用对学习来说不可或缺（并且新的教学技术可能经常会使人分心），但是一些新的技术使利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提高教学质量变得更加容易。最后，大学之外空前的社会力量——包括营利性大学、大规模开放式网络课程、商业性和非营利性的风险投资，以及网络——正在共同发挥作用，颠覆大学几个世纪以来稳定的融资模式。在其他的各社会领域，人们或者是适应这类力量，要么就被这类力量所压倒。那些身处其中的大学现在是时候关注并运用其独特优势——做研究——来提高教学质量了。

在本文中，我们将讨论社会科学知识和技术创新如何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教学。为此我们从社会科学研究中提取三项原则：（1）采用社会联系促进法，（2）教学相长，（3）及时反馈以完善学习。我们从社会和认知心理学、公共卫生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中为这些原则寻找证据。为了展示这些原则如何能够在教学中得以运用，我们借用自己在教学中发展和使用几种相关科技的经验，即哈佛大学的网络课程：Harvard's Gov2001:Advanced Quantitative Political Methodology（见 <http://j.mp/G2001>）。我们在第二部分说明这些原则在贯穿课堂内外的应用。

在第三部分我们通过讨论自然和物理科学中日益增长的进展来为教育研究奉献他们自己的一些教师岗位和其他资源。那些科学家们正参与其中、本质上是社会科学研究是令人满意的，但是社会科学家有同样的需求，即我们自身的教学议题，以及更多我们能够对共同问题发挥影响的该领域知识。是该我们做出贡献的时候了，在研究和资源上都是如此。就研究而言，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向前迈了一步。

一、社会科学学习的原则

由于因果推断方法的进步、数据收集的大量增加、人们对理论理解能力的增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在的人们如何以及为何比以往的人们学得更好、表现得更好。从大量的文献中，我们提取出三个能应用于提高教学质量的原则。

原则 1：采用社会联系促进法

采取诱导的方式让个体进行一些有利于自身的行为是非常难的，比如让他们减肥、多运动、不吸烟。但是让他们参加一些社会互动或者有利于社区的活动，相对而言会更简单，比如废物的回收利用、参加 PTA（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家庭教师协会）。社会学家已经掌握如何运用这种理论，使个人活动融入到集体活动中去，从而增加个人层面干预的有效性。比如，大型著作《弃权》，表现不同类型的个体居民联系带来的微小影响，比如电话、亲自拜访或寄信等联系方式。但是研究还增加了另一个社会要素，比如向一个受访者解释该人的邻居已经进行投票了，那么这个人的投票倾向将增加 8%。

同样的理论可以应用的更加广泛：当朋友们变瘦或长胖时，我们也可能跟着他们变瘦或长胖。当朋友们少喝酒、多锻炼、少吸烟时，我们也更倾向于这么去做。社交网络影响我们吃什么、快乐的程度、孤老终生的几率、住的地方、生活习惯以及婚姻能否长久等。社会联

系有利于废物再利用,影响着我们对参加宗教活动重要性的认识,还会影响我们其他的行为和态度。

社会联系影响着 we 生活中如此多的方面,以至于我们认为可以把它们应用于教育和学习。将许多学生放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或者小学努力使学生融入到课堂环境中,这不仅仅是为了提高效率。一些教育学研究在传统高等教育和在线教育的背景下对上述观点提供了论证。他们认为,由于社会联系相对较少,社区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当然,社会联系也会使学生分心,不利于一个共同目的的实现,使演讲脱轨。因此,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来使用这个不错的工具是很重要的。我们将在第二部分进行更加具体的阐释。

原则 2: 教学相长

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在几乎一半清醒着的时间里都处于“思维游离”(即思考的事情不是我们当前表面上所参与的)的状态中。虽然在看大学的讲稿时,文献中没有介绍思维游离的方法,但是这种几率低得让人怀疑。当人们思维游离的时候,他们往往是不快乐的,这不可能有助于学生的学习,更不用说教学评估。

所以,我们应该怎样让学生的注意力更集中呢?一个方法就是利用社会交往能减少一半这种效应的事实,即当人们与他人的交谈时,他们思维游离的时间只占到四分之一。如果我们可以把学生变为老师——安排他们把学到的知识解释给其他学生听,让他们提问、辩论、劝说,或者以社交的方式参与到课堂主题中来。这可能比其他方法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几乎每一个教学的人都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你自己学习一个主题时,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当你把同一个主题教给别人时,你所理解到的内容远比你自己的多。你教的人也会学到东西,尽管不是和你学到的一样多。“教学相长”已经在许多研究中得到了经验性的证明。我们认为这部分地是由思维游离的困难而非社交性参与解释的,而且被迫以一种更有效的方式来理顺思维以及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参与也能部分解释上述现象。我们举例说明了如何运用这一原理。

原则 3: 及时反馈以完善

假设你是一名准备参加奥运会的潜水运动员,并且周六你要进行训练。如果教练只是在整天的训练结束之后才对你的表现进行整体性评价,那么你能获得多大的提升呢?你可能会有一些进步,但如果你能在每次潜水后及时得到教练具体的反馈,那么你将学会更多。

大学教育亦是同样:经济学、心理学、医学等的研究表明及时且频繁的反馈能够促进学习。如果你尝试和失败的次数越多,那么你掌握技能的速度就越快。要落实这个建议就必须进行经常的评估,例如在一般的科学领域,当学生被证明是错的时候,他们学到的更多。这包括减少问题得到解答之前的等待时间,帮助他们认识到自身知识的局限性,同时鼓励学生在学习中遇到问题时及时提问,而不应该让他们一直等到老师的答疑时间或者下一节课。

二、落实原则

接下来,我们将提供几种把前文中提到的社会科学原则和信息技术创新结合在一起的方法。我们将在课堂外(见 2.1),课堂里(见 2.2)和教室中(见 2.3)运用这些方法。这些技术是我们开发或者试验的,但只展现了上述原则部分的运用。

2.1 课堂外

下面我们将要给出三项创新的案例,每一个均运用了前文提到的原则。在所有的案例中,我们试图使课程及其社会联系持续到下一节课。

将讲座纳入互动式作业:对教师而言,整合大学的课堂讲座,包括收集资料、做幻灯片、准备最终展示等,具有显著的启动成本。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旦讲座准备好后,重复讲座的边际成本很低。问题是讲座内容每年改进极少,导致同样的讲座不断重复,或者讲座虽有改善但是没有学到多少新东西。再加上现在很多讲座都是录制好的,使得学生不愿进入课堂,难以集中注意力进行学习。作为替代,我们指定了部分讲座的视频作为家庭作业,让他们使用我们帮助发展的开源协作视频技术。这个由哈佛大学学术技术部研发的系统已经发布了公共资源并可以被世界各地的教师所使用。这个视频协作注解工具(CAT)至少有三条优点。首先,有了CAT,学生们可以在任何时候点击“后退”。因为在社会联系的激励下,学生们很少在课堂上打断老师并进行提问,即使这样做是对自己有益的:因为学生们不想被其他同学看见而认为自己不注意听讲,不理解阅读材料或者是对老师和同学的不尊重,所以他们一般安静地坐着,试图看起来在认真上课。由于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神游上,所以一个现场讲座有时候和错过讲座的结果差不多。课堂外的协作注解有助于改变这种情况。

第二,如果后退键不管用,学生可以停止CAT的播放并且标注视频的时间点或者有问题或评论的相关幻灯片。这样,学生们就可以根据内容暂停视频,记录下需要澄清或者直接相关的问题,与老师在那时恰好讲到的内容相符合。其他的学生,由于被社会关系所激励,会帮助那些人澄清疑问,教职员工也是这样。在我们的经验里,关于阅读材料“脸书”(Facebook)式的热烈讨论经常在深夜进行。因为,在我们的经验中,学生们会被高度激励从而近乎实时地向他们的同龄人提供反馈,这种教学方式使学生发挥老师的作用,并且学习得到了极大强化。

最后,协作视频注解可以提高课堂教学体验。首先,它可以让教师回答问题并鼓励发问,即使没有讲完预定材料;协作视频注解可在课堂上没有时间时轻松安排讲座剩余部分。其次,学生们来上课准备更充分。当然,我们还给学生们布置了要阅读的的书面材料,但是,社会科学证据表明,通过不同形式看相同的材料能够强化学习。(大家可以练习我们所教的,我们已经在 j.mp/HUteach 发布了一个视频,解释我们在文章中提到的观点。)(未完待续)

[翻译:程康、裴瑶、孙跃、赵政]

[责任编辑:程康]

英采飞扬

【编者按】中东地区一向是世界的焦点，“阿拉伯之春”引发全世界瞩目，但发生在埃及和约旦的“阿拉伯之春”却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后果。本期英采飞扬的内容是一篇结构完整的英文学术论文习作，从政权合法性视角对该问题进行了探究。

Why Does the “Arab Spring” in Egypt and Jordan Have Different Political Consequences?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gime Legitimacy

Xiao Yao*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2010, the continuing instability of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has not yet to end. But the countries in which the opposition successes are all non-monarchy countries, and the traditional Islamic monarchy during this “Arab spring” is relatively stable, the regime is still running smoothly. The United States is a very important reason, but the regime’s legitimacy is the fundamental factor leading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to different results.

Keywords: Monarchy country; Non-monarchy country; Legitimacy; “Arab Spring”

Introduction

Since the end of 2010, continuing instability in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has not yet to end. This “Arab Revolution” has spread to more than 20 countries, and those governments suffered serious legitimacy crises, but the countries where the opposition succeeded are all non-monarchy countries, and the traditional Islamic monarchies in this “Arab spring” are relatively stable: the regime is still running smoothly; the public is generally supportive of the royal family, only to seek reform within the system, rather than to deny the legitimacy of the regime and overthrow the existing regime. So, why do these two kinds of countries that seem to face the same social unrest and regional upheaval have different results? It drew my great interest and attention. After the “Arab spring”, there is also an important trend that it becom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for these Arab countries to build the regime legitimacy in the region.

Debates and Consensus

So far, there are already some papers on this topic. Why the monarchy countries are more stable than the republic ones in the Arab spring? Victor Menaldo used a panel dataset of the MENA countries (1950-2006) and showed that monarchs are less likely than non-monarchs to experience political instability. Then he deemed that monarchy's political culture solves a ruler's credible commitment problem and makes the monarchy countries more stable.^① Ludger

* Xiao Yao, Maste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Shangha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Current main interest is legitimacy of government and interstate conflict.

① Menaldo, Victor,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s Resilient Monarch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4, No. 3, 2012, pp. 707-722.

Kühnhardt thought that traditional hereditary rule seems to be able to maintain power with more respect, possibly even with acquired legitimacy.^① Lorenzo Vidino put forward that there are many answers to this question, such as the legitimacy based on religion, that monarchies find it easier to carry out reforms — they can regard the ineffective administrations as a scapegoat. They also have the capacity that the ruling families to dispense massive economic handouts to the population, the GCC and the US' policies.^②

In these papers, the writers have different viewpoints on this question, some scholars deem that the reason depends on the economic level: the monarchy countries can dispense massive economic handouts to the population, but the non-monarchy countries did not have the capacity to improve their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so the people overthrow their governments; other scholars think that the political culture have caused the different results, in monarchy countries, and the kings are also the leader of the religion, and in Muslim countries,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make the countries stable. But all the reasons can be concluded in the frame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Legitimacy is the core conc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this theory, all the reason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ourses—election, performance and ideology. In my paper, I will discuss the three courses based on the “Arab spring” and find out which course of the legitimacy is the reason that monarchy and non-monarchy countries have the different results in the “Arab spring”. And to analyze the Arab spring in this frame can make the paper more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The Sources of the Legitimacy

“Legitimacy i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right to rule”.^③ From this perspective, it tries to solve a fundamental political problem, and to improve that political rights and obedience simultaneously. There are three sources of regime legitimacy: ideological legitimacy, performance legitimacy and legal-electoral legitimacy. A state is based on legal-electoral legitimacy when it takes laws as binding principles for all social groups, including state elites themselves, and when top leaders are popularly elected on a regular basis. Ideological legitimacy means that a state's right to rule is justified by a certain value system in the forms of tradition, religion,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Performance legitimacy means that a state's right to rule is justified by its economic or moral performance and by the state's capacity of territorial defense.^④ So in my paper I will use three sources of regime legitimacy: ideological legitimacy, performance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 legitimacy. I will try to investigate how the three sources of legitimacy affect the difference

① Ludger Kühnhardt: *The Arab Spring revisited: How the Arab Monarchies can survive*, <http://www.worldsecuritynetwork.com/Broader-Middle-East-Africa-Democracy-Human-Rights-Peace-and-Conflict/Kuehnhardt-Prof.-Dr.-Ludger/The-Arab-Spring-revisited-How-the-Arab-Monarchies-can-survive>.

② Lorenzo Vidino, *The Arab Spring and the Middle East's Monarchies*, <http://www.stratfor.com/other-voices/ara-b-spring-and-middle-east%E2%80%99s-monarchies>.

③ 让·马克·夸克著：《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王远飞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版，第 12 页。

④ Dingxin Zhao, “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Performance Legitimation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hina,”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 53. No. 3, 2009, p. 418.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country, and then to find out which kind of legitimacy has the most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different consequence. More accurate to say, I will put forward the reason why these two kinds of countries that face the same social unrest and regional upheaval have the different results.

Legitimacy of the Jordan and Egypt in “Arab Spring”

Egypt is a performance legitimacy and legal-electoral legitimacy regime. Egypt is an Islamic state, but a secular state, the alternation of the power based on the legal-election. Its national polity is prescribed by the 1971 Constitution, the Constitution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arliamentary system of government, emphasizing the primacy of law, the principle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as a governance foundation”.^① In addition, the Egyptian Constitution also provides that 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Egypt should be based on election. Although Egypt also regularly hold presidential and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but the Egypti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regulations allow only one candidate for election (In 2005 Egypt amended the constitution to allow multiple candidates), and then in order to keep the ruling status, they set up many obstacles to eliminate political rivals. And during the Mubarak regime, his family became the core of the autocratic rule, rigged elections and even wanted to follow the example of Syria to realize the ruling family. All these made the regime lose the legal-electoral legitimacy.

Egypt’s performance in recent years has lost legitimacy. Since 1990s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policy mistakes, coupled with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Egypt’s soci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s deteriorating: high unemployment rate, which reached 8.5%^② during the revolution; serious inflation, the inflation rate was more than 10%.^③ In 2010;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is widening. Meanwhile, Egyptian social corruption is serious, the government official amasses money for themselves, and efficienc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bribery. The Mubarak family, not only owns billions in foreign bank account, also by fostering personal political power established a regime of “crony capitalism”. Ordinary people’s hard life and corruption of bureaucracy rife in stark contrast, making the public feel the regime is not for them, and could not represent their interests.

On the other hand, Mubarak excluded domestic Islamic political forces. In Egypt, most people believe in Islam, so Mubarak’s regime had to respect Islamic faith. But in national political life, the Mubarak government’s manipulation of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s in sole charge, as well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emergency law exclude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other Islamism political power. Thus, religion is also unable to act as the solid foundation of the secular state. In

① 王泰：《当代埃及的威权主义与政治民主化问题研究》，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69页，转引自蒋灏：《试析当代埃及政府与公民社会的互动》，《西亚非洲》2011年第6期，第51页。

② 安维华：《埃及经济发展与社会问题探析》，《西亚非洲》2011年第6期，第20页。

③ 李意：《从埃及剧变透视中东国家变革》，《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4期，第42页。

addition, he implemented the pro-American and pro-Israel policy that hurt the Egyptians' emotion of the Arabs and Muslims.

These practices were actually against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It means that the regime lost the ideological legitimacy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religion, value and emotion. So the majority of Muslims in the current regime cannot find a sense of belonging and identity. When the government cannot contribute much in terms of performance, the legitimacy of the regime will be gradually fading away; overthrowing the existing regime and then seeking a new legitimacy become the common goals of the Egyptians.

Jordan is a country of ideological legitimacy regime. The whole name is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As the descendants of the Prophet of Islam, the King belongs to Hashemite family. Today, Abdullah II is the thirty-ninth generation descendant of the Hashemite and the forty-second generation descendant of the Prophet Muhammad. The royal family as well as the country has been "integrated", which has a natural political legitimacy.

Jordan protests were not for the purpose of overthrowing the ruling royal family. Although Jordan was also facing opposition's demonstrations and protests, but protests were directed against the secular government. The demonstrators did not call for King Abdullah's removal; they called for better governance,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removal of Prime Minister Samir Rifai, who was blamed for the rising commodity prices and political stagnation. They wanted political change, but not the regime change. Protesting against the government, demonstrators also held up to show allegiance to the king's portrait. "Jordan and Tunisia are different; we have the monarchy and love our king, just dissatisfied with the government, calling for reform."^①

Jordan has a monarch inheritance system, so its state legitimacy comes from the ideological legitimacy and performance legitimacy, if the performance legitimacy los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special status of the Jordanian royal family in the Islamic religion, still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public recognition can be found in ideological legitimacy. The certain value system in the forms of tradition, religion,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can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keeping the countries stable.

The two governments are both bad in the performance, but the Jordanian royal family based on the values and traditions still enjoy a high degree of legitimacy. Though state power belongs to the people, Mubarak's dictatorship had already made it less popular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election had already gone. Because of the long-period crackdown on Islamic religious power, the vast majority of Muslims were not in favor of Egypt's secular regime. So Mubarak's regime was more vulnerable to a seemingly unified public outpouring against them: their security forces were less willing to fire on their people, and the regime did not have elites in significant sections

① Ruth Eglash, "Arab World: Here, We Love Our King," *The Jerusalem Post*, Jan 21, 2011.

automatically behind them.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is the result of a specific confusion that why “Arab Spring” in Egypt and Jordan have different political consequenc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regime’s legitimacy is the fundamental factor leading to different results. The monarchy regime demonstrated much greater staying power than the non-monarchy regime. The monarchy often enjoys greater legitimacy than non-monarchy; many can count on religious justification, long-standing historical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ruling family, and a degree of popular affection---even pride---in the ruling dynasty. Legitimacy of the non-monarchy country mainly comes from performance and democratic election,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monarchy comes from the traditional religious values and the rule of royal. In the Middle East, it is easy for governments to lose the performance legitimacy and the democratic election is just cosmetic; but religious and national tradition is quite stable. When the legitimacy based on the performance and democratic elections is lost, it is very easy for people to overthrow the secular regime. But in Jordan, protesters complained about the government, they were not against the royal who enjoys certain transcendental position. Therefore, the monarchy countries can also maintain their existence despite their political division.

In the aspect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gypt and Jordan are faced with the same dilemma. Because of the poor living conditions, soaring inflation, high unemployment as well as the widening income gap, performance legitimacy is losing seriously. The legitimacy of Egypt is based on the elec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after the long-term autocratic rule, the performance and the election legitimacy has finally lost. Therefore, the regime is illegal in people’s mind. Unlike Egypt, performance legitimacy in Jordan is important, but its legitimacy mainly comes from the value and emotions. So Jordan can detach from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political turmoil, the king retains ultimate control, “allowing for a buffering of rage and resentment, and greater potential for real politics”^①. People respect the king because of the emotional and religious factors, which avoid the protest aiming directly at the royal rule, but only protest against the cabinet. Thus, performance legitimacy and the legality of the election are missing, which explains the reason why the monarchy and the non-monarchy were both affected in the upheaval in the Middle East. But the emotion legitimacy can explain the reason that the “Arab Spring” in Egypt and Jordan generated different political consequences.

After the “Arab Spring”,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face the task of rebuilding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this will be a difficult task. For example, after Hosni Mubarak stepped down, the Egyptian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took measures to quell the anger of the masses and rebuild the

① Robert Danin, “Why Jordan is not a Regional Domino,” in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the New Arab Revolt: What Happened, What it Means, and What Comes Next*, New York: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161.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new regime. Including Trade Minister Rashid, three former regime officials were sentenced to imprisonment.^① They try to establish the legitimacy of the new regime following the public opinion. Egypt has lost the performance legitimacy largely derived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policies mistakes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f the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reforms don't receive adjustment,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cannot be effectively alleviated, and the performance legitimacy will be difficult to rebuild and recover.

Overall, after the "Arab spring", the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have emphasized the value and emotional legitimacy. When the performance and election legitimacy act as the basis of the legitimacy, returning to the religious and traditional values is likely to become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legitimacy. "Islam as a political language, culture, traditions and sacred symbol, in a particular case is authority for political legitimacy; governments compete to use Islam to enhance political legitimacy."^② In the long-term, non-monarchy regime cannot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effectively, so people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Islamic religious forces as well as transcend secular Islamic beliefs and political ideas, which is a clear trend recently. For example, the Muslim Brotherhood, Egypt's largest opposition have been legalized and formed a political party and won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 a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force in Egypt. And then, Morsi who has the Muslim Brotherhood background won the election and became the president. Islamic traditional regression also reflects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emotion legitimacy in the Islamic world.

Arab countries, with their different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have their own ways of constructing legitimate states. Despite the influence of secularism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the religion of Islam is still the cornerstone of the legitimacy building of Arab governments.

[整理: 杨 雪、李安琪、胡阳阳、陈一一]

[责任编辑: 陈一一]

① “埃及 3 名前政府高官被判 10 年以上监禁”,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9/16/c_122040954.htm, 最后访问时间 2013 年 9 月 2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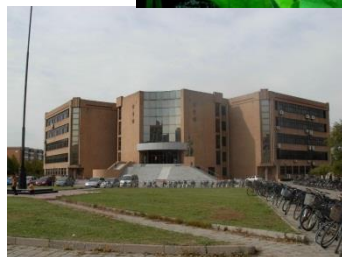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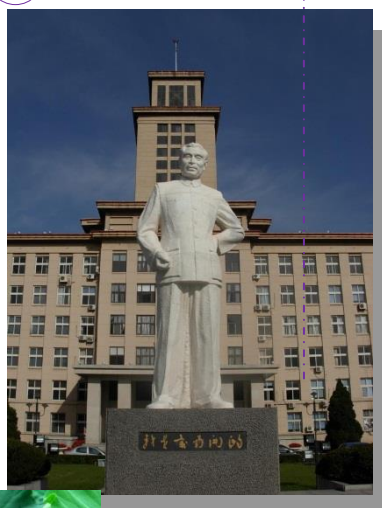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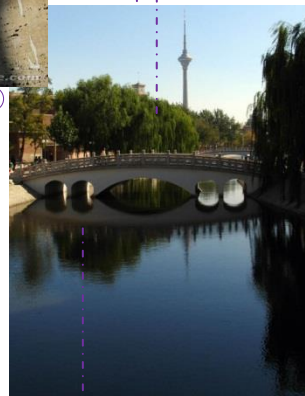
② 塞勒、孟金霞:《浅谈约旦穆斯林兄弟会与政府的关系》,《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 年第 3 期,第 34 页。

2013 级迎新特辑



美丽的南开，你的家

“美丽的南开我的家！
 美丽的南开我的家，我用青春伴随她。
 大中路旁杨柳翠，新开碧波映晚霞。
 古钟悠悠铭校史，主楼巍巍塑英华。
 美丽的南开我的家，我用一生去爱她。
 敬业广场书声朗，马蹄湖水映荷花。
 公能校训记心上，月异日新竞芳华。
 今日湖畔放声唱，明朝建功在天涯……”



【编者按】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里，南开园里又迎来了一批新鲜血液。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也因为你们的到来而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2013年的9月，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大学对于你们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也是一个熟悉的词汇，如何更快地适应大学的生活？师兄师姐们是如何度过他们的大学生活的？愿这一期的迎新特辑可以带你走近大学生活，给你启示。

【梦圆南开·院长寄语】

以周恩来为榜样 成公能兼济之英

亲爱的同学们：

1919年金秋，伟大的南开校友、开国总理周恩来进入南开大学学习，成为文科政治科第一期学生。94年后的今天，以周总理名字命名的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又迎来了你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学子，你们的到来给周政学院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在这里，我代表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全体师生衷心祝贺你们在高考和研究生考试中脱颖而出，以优异成绩成为南开周政学院大家庭的新主人。

同学们，踏入南开的这一刻，你们就开启了一段人生的崭新航程，从此，“南开周政人”的称号将伴随你们的一生，我们将与你们一起为珍惜和光大这一称号而不懈努力。在此，我也希望全体新同学尽快融入学院新家，尽早完成从中学生到大学生、从大学生到研究生的角色转变，秉承公能校训，赓续“爱国、敬业、创新、乐群”传统，学习锤炼，全面发展，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接受各种可能的挑战和考验，以自己的青春才智和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无愧于“南开”二字，无愧于周总理的后学。今天你们以南开自豪，明天南开周政将为你们而骄傲！

祝愿南开园的求学岁月成为你们人生最美好的记忆！祝你们在周政学院收获健康、学业、快乐与友谊！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吴志成

2013年9月3日

【经验分享】**你要去相信，没有到不了的明天**

裴 瑶*

亲爱的学弟学妹们，当你看到这篇文章时，你已经成为一名真正的南开国关人了。而我，却在犹豫，如何开口向你们分享从我手中流逝的372天。

刚进入大学，也许你接触的第一个词语便是“迷茫”，或许你一个人走在陌生的街道上始终没有找到一丝归属感，或许你跟朋友们一起吃饭开心地笑着的时候闪过一丝落寞。大部分刚入学的新生都迷茫地看不清未来的方向，更不知道要往哪走。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你应该要明白自己的目标，不管你所谓前途在别人眼里多么渺茫。你要去相信，没有到不了的明天。

以前感觉每个人的人生是那么不同，或者辉煌或者落魄，但仔细想想，人生轨迹却又有那么多重合。同样的开始，同样的离去，甚至拥有过一段近乎相同的经历。所以，如何在同样的经历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成功，显得是那么举足轻重。而学姐今天就以一个过来人的经验，向你们诉说大一生活的点点滴滴，希望你们，在大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

关于课程：大一大部分的课是校公共必修课，对于大家以后的学习具有基础性作用。大一的时候，最让文科生头疼的莫过于高等数学的学习，有些人甚至质疑文科生学数学的必要性。其实，数学是大部分学科的基础，在以后的学术道路上，数学一直是最有益的帮手之一。当然，如果你想以后双修经商院的课程，扩充自己的知识面，更好地服务于国际关系的研究，数学显得更为重要。除了校必修课，大一还会逐渐接触我们的专业课，大一所学的专业课都是比较基础的内容，打好这些基础，会为我们以后的学习奠定很好的基础。然而，不管是校必修课，还是专业课，都要尽量避免翘课现象的发生，因为从你第一次翘课开始，你就踏上了一条长久逃课的不归路。

关于阅读：阅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得不承认，校区的书籍有限，但是时常阅读杂志报纸对我们还是很有好处的，尤其是一个学国际政治的学生而言，要培养自己对新闻的敏感度。本部新图书馆或者天津市图书馆都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书籍选择。当然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不妨去网上买一些书籍。关于书籍的种类，大一可以选择阅读一些基础性读物，在后来的学习中，专业老师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大家可以按照老师推荐有所选择的阅读。当然，除了本专业的书籍，可以广泛涉猎一下，毕竟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等都是相关联的。

关于社团工作：适度参加一些社团对大家是有好处的。但不是盲目，也不贪图数量之多。加入1~3个社团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在社团中，尝试去认识不同的人，参加不同的活动。但需要注意的是如何安排好时间。我遇到过好多人，学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但为此牺牲了大部分学习时间，在成绩上一落千丈；也有很多人，把高中的生活节奏带到大学，所有的时

* 裴瑶，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2级本科生。

间都抱着课本埋头苦读,使大学生活失去了原有的色彩。

关于英语:不管什么专业,不论将来从事什么职业,英语都是特别有用的一种工具,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走“国际范”的专业,英语显得更为重要,有时候阅读一些英文的书籍或论文,倘若英语不过关,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学术能力。当然英语的学习决不能局限于课本,平时就不断地读一些英语书籍,看一些英文节目或者电影,尝试把自己放在一个纯正的英语环境中,而不仅仅是会应付四六级考试。

关于讲座:回想自己的大一,错过了好多讲座,满满的都是后悔。住在校区,可能有时候懒得过来,但是,越早接触一些国关领域的大师,会越早的激发你前进的动力。尤其是咱们专业自己请来的一些学术界的大牛,更具有针对性和专业性。刚开始可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可是所有的事情,积累多了,也就变得可能了。

啰啰嗦嗦说了一篇,就像不知道如何开始动笔,也不知道如何写一个结尾,但美好的生活,对于你们而言,才刚刚开始。忘掉一切,只管去行动。你要去相信,没有到不了的明天。

致可爱的你们

吕海*

大家好,首先欢迎大家来到南开,进入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成为国际政治专业的一员。作为一名大四的“老家伙”,在这里为大家写了一篇文章,希望各位能够从文章中得到一些启示,为今后四年的大学生活提供一点便利。

专业学习

作为国政人,首先要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专业。“国际政治”(或者说“国际关系”),在很多人眼里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要找到“国际政治”或者“国际关系”的定义很简单,《国际关系精要》和《理解国际冲突》这种国关入门书籍里都有。但要你自己说清楚什么是“国际政治”却没那么简单。即使已经学习了三年的国际关系,每当别人问起我“国际政治”这个专业主要学的是什麼,我都很难用一两句话介绍清楚。然而,正是这种不能表述的痛苦激励着我们去探寻一个学科的真谛。不了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不了解就失掉了好奇心。

在学习国际关系的过程中,没有适用于所有人的学习方法,也没有一定要遵守的“金科玉律”。我仅列出以下几条建议,以供参考:一是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批判性思维。不同于高中的每个学科都有的“参考答案”(其实就是唯一且正确的答案),大学学习很多时候并没有答案。国际关系理论的几大范式各自都有着不同的“三观”,诸位在学习的时候不要被“洗脑”,也不要一味反驳,而是需要有自己的想法。二是要需要广泛阅读。国际关系学科是一个交叉属性很强的学科,要学好这个专业,需要对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地

* 吕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0级本科生。

理、统计等学科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这就对阅读的广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三是建议各位发挥“学以致用”的精神，平常多多运用所学到分析方法和相关知识看时事，不仅会巩固专业知识，还能得到意想不到的趣味。

很多同学可能并不是第一志愿进入国际政治专业的，所以大家可能会有关于专业就业前景的困惑。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在就业市场上，有多少人是真正从事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有些学科可能会给你较广的就业面，但是可能并不能给你想要的职位。我始终认为，一切以学科为借口的对就业前景的焦虑都站不住脚，一个人的未来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个人素养和能力。诸位在关于专业选择的问题上也要发挥批判性思维，切忌盲目跟风。

学生工作

大学不仅有学习，还有各种学生活动，这些学生活动的背后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学生组织。我在政府学院学生会工作过，现在也还在《新视界》任职，在这方面也算有点经验。首先是给大家普及一点学生组织的知识。在南开大学，学生组织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官办组织与学生社团。官办组织组织一般分为校级和院级两个层级，同时形式上不仅仅只有学生会、团委，现如今还有很多官办性质的组织，每个院可能也有自己特色的官办组织。学生社团则一般都是以兴趣为导向的组织，进入时你需要想清楚你是想要进入这个社团的管理层还是只是希望作为社员或者会员参加活动，以免今后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在这么多学生组织中，我干的时间最长的就是咱们的系刊《新视界》了。这是一个由国关学生自己组织运营、由院系赞助的“半官方”学生组织。以我在《新视界》的工作经历为例，给大家讲几点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是需要明确自己进入一个组织的目标，这样才不会迷失自己，为了学生工作而工作。我加入系刊的目标比较明确：一是学习国际关系专业的知识和编辑方面的技巧，二是希望通过系刊认识前辈获得信任，互相交流和学习。有了这个目标，在这个组织里你才会有不断工作的动力，也才会有收获。其次是要有毅力，不要畏难。学生工作中一定会遇到很多你之前从没遇到过的困难，但是这正是你学习的大好机会。例如在系刊，有一次我就遇到了需要我组稿统稿的任务，但之前我对相关的编辑排版知识一点都不了解。在不停地“骚扰”前辈和自己不断进行各种实验的情况下，最终还是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也收获了很多，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

总之，诸位在学生工作方面要有明确目标，目标不明确的话可多多尝试，但切忌贪心，同时要选择一两个自己想要长期努力奋斗的学生组织，这样对你自己的责任心和相关的能力也是很好的锻炼。

大学生活很复杂，私以为大学生活用来尝试的，因为大学校园中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而今后在社会中你都很难找到这样一个能给你提供无限可能的地方。但也要记住要懂得选择，不懂得放手就是太贪婪，而选择之后也不要为丢失了其他的机会而悲婉，忠于自己的选择就是忠于自己的人生。最后祝愿各位都能在大学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幸福！

三个词与大学

王芳琳*

各位你们好!首先恭喜大家来到了一个新的战场。在刚刚过去的高考的战场上,你们是胜利者,是走过独木桥的赢家。但是正如那句俗语“人生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挑战所组成”,所以不可避免地,你们来到了新的战场。这是一个没有父母的日夜陪伴,没有老师的细细鞭策,一切都要靠自己的战场。所以这样更加具有挑战性,我想你们会适应的。

不知你们是否关注过这样一条新闻“2013年是史上最难就业年”?如果你们关注过,说明你们已经开始对大学生活有了规划;如果你们还没有关注,请立即开启自己的大脑,去畅想未来。或许高中的老师曾告诉你们“大学生活是安逸的,没有课业的压力,是轻松的”,如果你们曾经相信了这句话,并依此作为高考的动力,那么现在请放弃这样的想法吧!大学生活不是安逸的,甚至是很辛苦的。再也没有人督促你们每天去学校,你们自己决定今天是去学习,还是去玩耍;再也没有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努力,你们自己确定如何设定好一步一步规划;再也没有人忍受你的骄纵,你们自己学会如何包容别人。坚强,勇敢,勤奋,诚实,自信,这些优良的品质需要你们自己在大学生活中去学习。这能不辛苦吗?

今天我写下这篇文章的目的仅仅是想告诉你们三个词:欲望、坚忍、凶狠

说到“欲望”,总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词。其实,这是一个中性词。每个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欲望可以促使人去做一件事情。所以欲望是所有动力的开端。所以刚刚进入大学的你们,一定要首先培养自己的欲望。不论你们是想成为“学霸”,还是“社团达人”,亦或是两者兼备,先培养自己的欲望吧。以前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印度湿婆,她告诉我:当我内心凌乱,失去方向时,就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摸着自己的心,听听心的欲望。现在,我想将这条建议告诉你们。当你们不知道自己的追求是什么的时候,听听内心的声音,它会如实告诉你。大学里面的“诱惑”很多,这里有124个社团,数不清的社团活动,数不清的学术讲座,数不清的兼职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中,有抱负的人就会产生很多欲望,这时候你们需要做的就是认真地做选择。时间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都是24个小时,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最大化地利用这24个小时。你们不要将自己都当作是天才,认为自己在各个方面都可以做好。天才出现的概率太低了,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做好选择,将自己最想要做的事情做好。如果你重视国际政治的学习,那么请你认真上课,广泛阅读相关书籍,关注时事,提高英语;如果你重视社团活动的参与,那么请你选择最感兴趣的1-2个社团,认真做事,真诚待人,实现自己最大的价值;如果你喜欢自由,不想被拘束,那么请你在学习国际政治专业知识之余,一定不要放弃对自己的培养,这是对自己莫大的锻炼。

说到“坚忍”,大概就指两个词:坚持和忍耐。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怀揣着一个成功梦,但是成功的人少之又少,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坚持和忍耐。成功是不

* 王芳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0级本科生。

容易的，道路之艰难是你难以想象。如果你想成功，那么请学会坚持和忍耐。当你在学过国际政治的过程中，发现有些东西（比如理论）真是太无聊了，请你坚持。这是你自己选择的路，就必须由你自己来承担辛苦，况且你还希望成功，不正应该坚持吗；当你在社团活动中遇到问题，请你学会忍耐，并认真想办法。这个世界上大多事情都是人在做，所以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社团活动中的大多问题都是人的问题，沿着这个思路，你就会想到解决办法；当你在处理感情问题时遇到困哪，也请你先忍耐，不要“破罐子破摔”的态度。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好好找对方谈谈，相信问题会迎刃而解。“司马迁以坚忍的态度写出《史记》；贝多芬以坚忍的态度奏响生命的乐章”。我想这是你们高中课程中总会用到的例子。现在你们来到了这个战场，可以检验自己的战场。不要口头上说自己是如何能坚持，如何能忍耐，去做吧，去做吧！

说到“凶狠”，大家似乎会认为我用词不当。凶狠不是说坏人的吗？凶狠不是说动物的吗？其实，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对自己狠一点。我们不应该将凶狠施加到别人的身上，但是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狠一点。人都是有惰性的，当看到别人玩耍，你也可能放下手中的学习和工作，告诉自己“别人在玩，为什么自己要工作呢？”是啊，为什么你们要学习呢？因为你们有更高的追求和更远的目标。哈佛大学的图书馆有很多箴言，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此刻学习，你将圆梦；此刻打盹，你将做梦。当你翻动着手中的书页实在无法坚持时，请你站起来洗一把脸，继续看书；当你处理社团问题一团糟，几乎想辞职走人时，请你坐下来重新理清头绪。放弃是很简单的，你需要做的只是撒手不干。如果你志存高远，请不要做放弃的那个人，对自己狠一点。每天多学习一点，每天多运动一点。以凶狠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惰性，走过大学青春，你将收获无穷的“财富”。

我已经完整地走过了三年的大学时光，有过失败，有过成功，有众人赞叹的喜悦，也有独自辛苦的落寞。但是这三个词语“欲望+坚忍+凶狠”伴我走过了这段岁月，也即将伴我走向未来的时光。今天和你们分享我有关这三个词语的体会，希望这对你们会有所帮助。记住，在这个战场上，你们是孤独的，也不是孤独的；你们是成功的，也不是成功的。

当我们谈论大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姜忆楠*

很高兴能够和大一新入学的学弟学妹们聊聊我在大学四年本科生涯的经验和教训。大学很可能是工作前能够由自己独立支配的最后一段时间，因此，好好使用大学四年，无疑能够为未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打好基础。我想先聊聊如何实现目标，而后就大学的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经验教训。

* 姜忆楠，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3 级硕士生。

一、目标及其实现

“对于没有方向的船，任何风都不会是顺风”，设定一个自己喜欢且有前途的目标能够事半功倍。目标有长期和短期两种。短期目标很好理解，姑且不论，据我观察，很多同学在大学期间比较缺乏的是确定适合自己的长期目标，因此导致自己在大学的四年时间里四面出击，不能真正将自己的努力做出成果、服务自身。

如何建立目标呢？很多同学会在上大学之初就选定自己的“未来”，但是决定走哪条路对于如何分配时间和精力非常重要，因此建议大家不妨“走着瞧”：先不急于定方向，在一二年级，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和组织，见识各种各样的人，看各式各样的书，通过观察和思考自己到底喜欢和擅长什么，能够在哪些方向更有作为，在大三之前确定大致方向。

实现目标的方法很简答，就是做计划。长期计划很容易变成清谈，难以实行。原因在于长时段会让人有一种偷懒心理，觉得时间还早，工作量又大，所以需要长期计划拆分成可以一件件看到 **deadline** 的小计划。比如，计划在一年内看 10 本专业书，除去准备期末考试的两三个月，平均一个月看一本专业书。按照一本书三百页算，平均一天看十页。这样每天只用看十页书，花不了一个钟头，经过一年的积累，就相当于看了十本专业书。一口吃不下胖子，积少成多却可以让你走向成功。

二、专业学习

作为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如果不能对本专业的各个方面有大致的了解和独特的见解，无疑是不称职的；况且你会逐渐发现国际关系非常有意思。

如何学好专业课？我的经验是在听课、阅读和写作三个方面下功夫。在听课方面，积极思考和发言对于锻炼资料收集、思考和表述能力很有好处；有不明白的问题应该多向老师请教，咱们系的老师都是国关领域的专家，人也都非常和善，乐于为同学们答疑解惑，有时，老师的一句点播很可能比你自已看几本书的收获都大。在阅读方面，阅读本专业的一些经典著作是必要的，老师们也会在开学班会或每门课的第一节课推荐阅读材料；腹有诗书气自华，多看专著和文献也是写论文的基础，除了图书馆，学校也有很多网上资源可以查询（下文会提到一些具体方法）。在写作方面，很多课程会要求写课程论文，掌握一定的写作规范是很必要的，除了老师讲解如何写论文，多看一些规范的论文也很有帮助（学校购买了一些可以下载论文的数据库，联接了校园网之后，就可以登陆 **CNKI** 数据库下载中文期刊，在 **EBSCO** 等处可以搜索下载英文期刊，这些数据库的链接可以在学校图书馆的网页上面找到。

三、英语

英语的重要性无需多言。但悲哀的是，我见过的很多同学只是口头上承认英语的重要性，在行动中并不多加关注，较差的英语水平从本科三四年级开始将成为他们在学习、工作方面的束缚。其实，每天背 50 个单词，听一课听力，花不了一个半钟头，但一年下来收获就很

可观。没能在本科学好英语绝对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学长学姐的血淋淋的教训，希望学弟学妹不要重蹈覆辙。

四、学生工作

学生工作是大学阶段不可或缺的部分。通过相关的平台可以更好地展示自己，在完成工作和接与他人的接触过程中更快成熟起来。建议大家在官方学生组织（如政府学院或学校的学生会、团委、团校、青年志愿者协会）和学生社团或系刊《新视界》中选择几个，最后留在1-2个和自己未来发展方向相关的组织中（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官方学生组织可能会出现不好退出的情况，所以选择加入时要慎重，院学生会在这方面相对会好一些）。我的感觉是，经过入学的兴奋期之后，各类学生活动千篇一律的一面会愈发明显，所以很多组织在纳新时表现出的良好形象不足以作为决定你加入该组织的依据，在选择学生组织时需要更多考虑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自己在这个组织中是否有继续做下去并为它奉献的可能。

五、职业技能

如果明确了自己未来的方向，自然可以对症下药，提前积累自己的职业素养。如果还没有确定方向，一些基本而常用的技能应该在本科阶段就开始积累，如文字处理和排版技术、清晰表达自身意愿的能力、处理量化数据的能力等无论在学习还是工作中都非常有用，photoshop之类的软件能够让你在宣传工作中脱颖而出。

想要掌握一门技能的最直接原因是你需要它，在方向不确定的情况下，有意寻找锻炼自己的平台和机会就显得很有必要。我在刚进入大学时只知道word软件能打字，加之课程论文对格式的要求很简单，如果就这样下去，可能我直到毕业也不会编辑哪怕稍微复杂一点的word文档。但是，我后来加入系刊《新视界》编辑部，经常需要审查word版本稿件的格式是否规范，这涉及到word的各种各样的使用问题。尽管很多内容之前根本没见过，可是工作需要，也只能硬着头皮上。随着审过的稿件越来越多，我逐渐了解熟练掌握word的很多高级功能和常见的使用错误，令我在论文排版和各种公文写作上受益颇多。

六、主动学习的习惯

主动学习对大学生而言，可能是最重要的习惯。老师讲授的东西终归有限，要想解决实际问题，必须主动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正如之前所说，我刚开始参与《新视界》杂志的编辑时，还不懂如何处理各种编辑问题。怎么办？通过对照上一期成品的word版本进行逆向测绘，自己去摸索各部分的格式或设置是什么样的，目的是什么，就会大致了解《新视界》的编辑规范；遇到不懂的技术问题就上网查，多尝试几种搜索方式，十有八九能找到答案。现在《新视界》的编辑规范已经出现，很详细，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第一次统稿时为了做出正确的word统稿而熬夜查资料的时光。“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只有亲自寻找和使用过的才真正是自己的，永远都不会忘。

以上是我在本科四年的一些总结,经验为辅,教训居多,希望能够对学弟学妹有所助益。最后祝大家在各自的本科学习生活中能够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学习攻略】

大学学习之本校双辅修

郭晓琼*

大学生活丰富多彩,非常高兴能在《新视界》和大一的同学们着重分享自己在大学的双辅修经历。在大学,除了学习本专业的知识外,我们也有机会跨专业学习其他专业的知识,并且这段学习经历还可以得到学校的评价和认证。

“双辅修”实际上是双修和辅修的合称。无论是双修还是辅修,都只能另外选择一门专业进行系统学习。与旁听和蹭课不同,双辅修是对第二专业的更加严谨和系统的学习,与该专业学生一样要经历同样的修学分和考核的过程。双修和辅修的区别在于,双修要学习第二专业的所有课程并撰写毕业论文,要修 80-100 个学分,符合要求的话会授予第二学士学位;而辅修则不要求学习所有课程,只修大致 40 个学分即可,最后获得的是辅修证明。

选择进行双辅修的理由有很多,有的人是出于兴趣,为了获得更多知识,开阔视野;有的人是为了获得两个学位,使自己在毕业后找工作更有优势;也有的人是为了跨专业考研而做准备等等。但不论是出自何种原因,我们在做出选择之前最好慎重考虑,结合双辅修的特点、自身的情况和对于未来的打算来进行综合考量,轻率的决定能避免则最好避免。比如,由于双辅修是同时学习两个专业,必然要耗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如果未来目标是考研的话,有可能会因为学习两个专业而导致不能用心准备考研;但是,如果第二专业就是考研专业的话,也有可能因为学习了这一专业而增加了考研优势;因此是否选择双辅修就要根据自身的学习能力和情况来定了。我们申请双辅修的时间是大一下半学期,大概在四、五月份,在这之前我们完全可以多与高年级的同学以及老师进行交流,从而做出一个对自己负责的决定。做出决定之后,就要准备递交双辅修的申请。双辅修的申请各院筛选流程有所不同,但首先都要看学分绩,因此学分绩越高,申请双辅修的优势也就越大。除此之外,有的还要看数学成绩,有的要进行英语考试,如果是申请辅修小语种专业还要进行小语种考试,申请双修金融也要进行考试。需要注意的是外国语学院的所有专业都只能辅修,不能进行双修,因此在作申请准备时最好把这些情况提前了解清楚。

申请通过之后,双辅修从大二上学期开始。可能有的学校的双辅修是专门设置了双辅修班级,但我们学校大部分是和第二专业的学生们一起上的。因此在选课时我们就要根据自己

* 郭晓琼,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1 级本科生。

专业的课的情况、根据对方院系的培养计划进行选课,调整时间冲突的课程,保证两个专业的学分都可以修完。由于双辅修要学习两个专业的课,因此课程量、作业量也会加大,空闲时间就比较少。期末考试时也要对更多的科目进行复习,多时可能会达到17、18门课程。有时两个专业的考试时间会发生冲突,这时候还要申请缓考来错开考试。虽然这些听起来比较辛苦,但是双辅修本来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是对自己学习能力、时间安排的挑战,而且在双辅修的过程中还会认识不同专业的老师和同学,收获知识的同时也收获更多的朋友。

在大学学习过程中,虽然双辅修的学习经历并不是每个人必须要经历的,但是如果选择双辅修的话,毫无疑问你可以从中锻炼自己。而最直接的益处就是让你的大学生活更加充实和多样化。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从双辅修的学习中收获了很多,不管是知识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希望本文对双辅修的简单的介绍能给大一的同学们对了解大学学习能起到一点帮助。

大学学习之跨校双辅修

刘芮宁*

南开提供给我们的学习机会是如此丰富多彩,除了可以在本校辅修双修其他专业,更好地促进自身的学习和发展,我们也可以跨校双修天津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

春去秋来,又是一年迎新季。在这里分享一些关于我在选择双修工管的一些小事,希望能够对大一的你们有所帮助。

从大一开始,就从学长学姐那里了解过天大工管的双修,它与我们学校双修最大的不同是时间是安排在周六日,这样对于本专业的课并没有任何耽误。而这也是我选择双修工管的最大原因;每个人的规划都有不同,如果说你對自己本专业兴趣浓厚并且想要继续深造(这里指继续读研读博),我并不建议选择双修,双修更多的作用是给一些对想要双修的专业有些浓厚兴趣或者本科之后直接工作的人,例如在有些职位中会需要明确表示需要工管专业(双修认可),这个时候你就比其他的竞争者机会更大;同时在学习工管的课程的时候也是提供你一个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当然这也是我的个人见解。

如果去问所有双修过的人,估计一般的回答可能都是“双修需谨慎”。因为机会成本实在太大。选择了双修,你就经常会给自己一种暗示,觉得自己很忙,然后也会失去其他很有价值的机会。比如有很好的讲座你因为上课听不了,有很好的比赛你也没时间做,有丰富的活动你无法参加,有很多可以充实自己的资料都没时间去看。即使工管和其他双修的来比时间比较短,但也有很多同学在学习课程期间最终放弃,尤其是不要盲目跟风,很多同学看到同寝室的同学都在双修于是自己也就心头一热报名,其实,证明你自己并不一定要和其他人一样,最重要的在于你自己的规划是怎样的。话说回来,把自己本身的专业学好是很重要的,无论干什么,成绩不可能不被关注。所以关于双修工管,大家选择一定要慎重之后再慎重。

* 刘芮宁,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1级本科生。

明确了想要双修的意向之后,就是双修工管的条件,一般来讲决定是否双修成功的条件就是你的学分绩,天大工管不像一些双修的专业需要笔试和面试,只需要你提交一份表格就可以了,而起决定作用的就是你的学分绩,还有也取决于当年报名双修的人数,你在这些报名者中学分绩靠前就可以了,如果硬要下个指标的话一般情况下学分绩 85 分左右就差不多可以成功申请双修。

成功成为双修的一员,面对的就是失去每周六日课外时间的残酷现实,教室是在南大的主楼,有时候一个上午上满四节课的感觉真的很痛苦,但同时在用心的过程中你也会学到很多东西。有很多课是偏理科的,这不仅需要课上每节课的认真笔记,也需要在课下巩固记忆。老师都是天大的,除了法定节假日每周都会来上课。而考核的方式,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计分标准,大多数都是根据课上表现(点名,作业的完成情况)和期末考试两方面来打分,当然也有课是论文结课。考试的时间一般都会在南大本专业课考试之前的周六日进行。并不耽误本专业的复习,但是成绩低于 60 分就意味着被挂。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天大的工管需要修满的学分是 52 分,如果在双修期间一共被挂两次,也就意味着双修失败。之前修的课只能算作 E 类课计算。

开学伊始,一切充满新的气息和新的选择。希望这篇短文能够给想要双修工管的学弟学妹们起到一点点启发或帮助。

大学学习之选课

沈琳*

选课是大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再不同于高中,每人每天上着一样的课,你可以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通过设计自己的课表来决定自己每天的生活。接下来,我简单向大家介绍一下选课的有关情况。

选课主要包括预选,正选和补、退选三个阶段。预选和正选一般发生在上个学期的期末,也就意味着你在上一个学期的期末就要计划好自己下个学期的学习计划。预选的结果大可不必在意,因为正选才意味着选课的结果,但是仍然可以通过新学期的补、退选来修改自己的课表。新学期开始以后,可以在试听了老师的课以后再决定是否选择该课。当然如果选择该门课的人数较多,就可能出现没有选上该门课的情形,一般这种情形更多地出现在 A、E 类课,C 和 D 类课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稍后会介绍 A-E 五个类型的课。

大一上学期的课基本不用自己选择,学校已经给大家安排好了要上的课,开学之后需要大家去机房确认,会有师兄师姐去指导确认,唯一需要调整的是英语提高班的同学的英语课(高考英语成绩在 140 分以上会要求选英语提高班,不和本班同学一起上课),大一下学期开始大家就可以在有网的地方自主选课了。

* 沈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1 级本科生。

学校的课程主要分为五类：A类课，校公共必修课，比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体育课，英语课等等；B类课，院系公共选修课，我们院暂时还没有B类课；C类课，专业必修课，顾名思义，也就是毕业之前一定要修习的专业课，比如你们这个学期要上的国际关系概论和政治学原理；D类课，专业选修课，这个类型的课大一上学期暂时没有，在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就有机会选择，在毕业之前修够一定的学分就可以；E类课，校公共选修课，这个时候可以选修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比如日本茶道，国学导论等等。

我们国际政治专业要上的课主要是A、C、D、E类，每位同学手中都应该有一份国际政治专业培养计划，该份专业培养计划中明确列出了符合毕业要求的每类课程的学分要求数量，因此每位同学在计划自己的课表时，一定要考虑到专业培养计划的要求。尤其是关于D类和E类课，D类课一般是要在毕业之前修满30个学分（你们可以参照你们这一届的专业培养计划），E类课一班是15个学分，但是从2011级本科生开始要按照学校公共选修课程四个模块的课程目录来选择，四个模块分别是自然科学类课程，社会科学类课程，人文科学类课程和体育、艺术类课程，每类课程至少修习2个学分，以保证我们广泛涉猎各种知识。

另外，课程的选择也是非常讲究技巧的，如果有的同学需要准备考研，准备出国，或者是双辅修的话，可以考虑尽早地修完所有学分，以便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复习和自由地运用，但是在选课的同时，又要考虑到自己的接受情况，因为一旦一个学期选的课程过多，容易出现精力不足，无法认真对待每一门的情况，因此各位在选课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考虑。

有些同学会在选课之前较多地咨询师兄师姐的意见，个人也认为这是不失为一种了解该门课程的方式，但是因为老师风格的不同，个人感知方式存在差异，每个人对于一门课的评价总是有些许差别的，因此我更鼓励大家多多去尝试，自己去试听，让自己的内心来告诉自己是否想选择这一门课，这样我们才有更多的可能性去接触到更多不一样的课程，去更多地扩充自己。

最后祝大家选到自己想选的课，愉快地度过自己的大学生活。

【班级风采】

勿忘，且看且行

庞强*

一零国政，作为系刊的班级风采栏目内容将会是最后一次登场，三年了，这个数字似乎也在宣示着这么一个“古老”的班级即将终结他们曾经的辉煌。其实，不然。一零国政这个名字在他刚刚诞生的时候就注定了会一直持续他的青春，同样也用这种生机影响着之后的国

* 庞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0级本科生。

关系的学弟学妹们。生生不息，永远大一。

班级风采就要有班级风采的感觉，一零国政拥有 30 个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年轻人，从 2010 年起他们对大学的好奇、憧憬与努力就未曾磨灭，三年多，他们被冠以各种的荣誉，校级、省级的荣誉称号均包揽在怀。短短三年，却如白驹过隙。三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同患难的军训第一课，迎水道校区的奇幻旅程；主楼 317 的爱心早餐，大快朵颐的同学情谊；班级建制的精心筹划，班歌班标班衫班号的现今流传；奔至本部的开篇晚会，起航巍巍国政之旅；长途大巴的数次出游，野外烧烤郊外踏青；校园活动的主题活动，五四评优现场的最强音；贴心的数次女生节男生节，甚至全班表白的情人节，如果用不恰当的比喻词，应该就是“罄竹难书”了。



一零国政，总在别人的眼里那么的光鲜，可是当你真正融入一零国政的时候就会发现她是这么的鲜活，就像一片叶子之于树根，每个人对这个小集体都怀有满腔翠色欲流的热爱。而这，才是一零国政真正可贵的东西。

大四将会是一个离别的学际，大家各奔前程是成长的规律，但是曾经的那份班级情谊如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又似辛夷幽隐，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所以，即使真的“各奔东西”，曾经的浓郁也会沉淀成永恒的香醇。

然而，作为大四的班级，过去的历史不再能映衬一零国政的存在，今年，2013 年的九月开始，属于一零国政的毕业季正式开启。一零国政，将会用自己的方式，每个人的个性为“10 国政”刻下自己最后的痕迹。

且看且行，10 国政毕业之行。

11 国政大家庭

于凯玥*

又是丹桂飘香的九月，又是迎接新生的季节，看着新生们稚气的脸庞，听着训练场上的响亮的口号声和百团大战热闹的局面，让人不禁想起两年前的我们。

33名来自五湖四海学子，33张充满朝气的笑脸，共同的兴趣目标让我们33颗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组成11国政这个大家庭。我们这群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年，由相遇到相识，从相识到相知。

彩虹因为七种颜色和谐地组合在一起而美丽，一个班集体因为每个独特的成员而更加有魅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棱角分明的个性和独一无二的特点，有的含蓄内敛，有的活泼张扬；在这个班集体里，有着学习优异、勤奋刻苦的学术精英，有着能言善辩、热衷学生活动的领导人才，亦有艳惊四座，技压群芳的文艺表演天才。11国政因为有他们变得更加独特。

然而一个团结向上，互相关爱的集体才是我们每个人的依附。班级通过组织各种活动，增加了彼此的了解，增进了彼此



的感情。香山之行，我们欢声笑语；团日活动，大家团结协作；班级聚餐，每个人各显身手……这些都将成为大学生活的美好回忆，更重要的是它向每一位同学传递着一份家的温馨，这一切的一切激励着我们，感动着我们。无论何时，我们都肝胆相照、同舟共济。学习上资源共享，互相激励，生活上互相帮助、互相关心。

这就是11国政，多元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小社会，在以后的2年里，我们11国政的33位成员将在一起学习、生活与成长，去品味人生一次又一次的精彩！

* 于凯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1级本科生。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朱 梦*

12年的盛夏，来自五湖四海的我们相聚于南开，共同组成了国政大家庭。那时大家的脸庞青涩未退，对于陌生而新鲜的大学生活，我们都有着同样美好的憧憬。这一年来，我们相知相识，在一次次的班级活动中收获了珍贵的友谊，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难忘的回忆会成为生命的馈赠，在岁月的河流中熠熠生辉。

往事如重现般历历在目，去年的炎炎夏季，我们共同体验了大学的第一课——军训。那段时光里，我们都是钢铁七连的英勇战士，正步迈得齐刷刷，口号喊得震天响，为了合唱比赛不停地练声练唱，丝毫不敢怠慢。军训虽苦虽累，但有了朋友的陪伴，我们不再孤单，宿舍中的一次谈笑风生就能把所有的苦转化成甘甜。也正是共患难，成就了共成长，共成长带来了共欢笑。

一年的学习过程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丰富的知识，也有同学之间互相学习的团结精神。12年的9月25日，我班开展了“知南开剧史，负青春使命”的学习讨论活动。在认真欣赏完话剧《红旗谱》之后，班级组织了有趣的配音竞赛，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了讨论和总结，不同的思想相互碰撞，激发了大家的学习热情。这次富于历史性和艺术性的活动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班级更加和谐默契。

一个有凝聚力的班级，最不可或缺的就是彼此的关怀和爱护。去年冬天我们就举行了一次温馨的班级活动，即“你家，我家，是大家”家乡特色展示活动。我们以不同的家乡分组进行展示，由北及南，如天津组、山东组、湖北组、贵州组等等。视频、PPT、唱歌、绕口令等形式统统被搬上展示的舞台，这次活动不仅让同学们了解到各地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也挖掘出了每个人的表演天赋，体现出不同于平时生活的他或她。活动的尾声还出现了令人感动的一幕，我们为当天过生日的皮敏维献上了真挚的祝福，大家一同唱起生日快乐歌，教室中充满了温暖的气氛，让远在他乡的同学们并不感觉孤单寂寞。

精神抖擞，运动会上舍我其谁；千机万辩，辩论场上魅力无限。这就是12级国政班，团结奋进、朝气蓬勃、温暖和谐。正如那首《沁园春·雪》，“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的画布展开，我们挥笔成彩，在年少的岁月里，不停地向前奔跑。

* 朱梦，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2级本科生。

【编者按】此书目由国际关系系的老师制作,适合对国际关系学科感兴趣的低年级本科生使用,是一份尽可能精简到最少的书目,目的在于帮助大家对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对象、核心概念和理论流派有基本的了解。2012年的《新视界》迎新特辑就采用了这份书单,而今朝花夕拾,就是因为经典永远具有魅力。

国际关系专业学习入门推荐书目

一、国际关系概论

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五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原版影印】

卡伦·明斯特:《国际关系精要(第三版)》(潘忠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康威·汉得森:《国际关系》(金帆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

威廉·内斯特:《国际关系:21世纪的政治与经济》(姚远、汪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约翰·罗尔克:《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宋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邢悦:《国际关系学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二、国际关系理论

[法]达里奥·巴蒂斯特拉:《国际关系理论(第3版修订增补本)》(潘革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加]罗伯特·杰克逊:《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宋德星、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

[挪]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白云真、李开盛:《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概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宋伟:《国际关系理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三、国际关系史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美]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 香港: 国际文化出版社 2006 年版。

[美] 理查德·克罗卡特:《50 年战争》(王振西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 年版。

[美] 罗伯特·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杨韵琴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英] A. J. P· 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

[加] 卡列维·霍尔蒂:《和平与战争: 1648-1989 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的进程》, 上海: 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四、经典著作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年。

[英] 爱德华·卡尔:《20 年危机(1919—1939): 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

[美] 肯尼思·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 一种理论分析》(倪世雄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 年版。

[美]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 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李保平、郝望、徐昕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美]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美]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美]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门洪华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美]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 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美]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英]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张小明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

[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五、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美] 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论》,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年版。

[美] 斯蒂芬·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陈琪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挪] 斯坦因·拉尔森:《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版。

[美] W·菲利普斯·夏夫利:《政治科学研究方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版。

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研究方法(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李少军:《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六、美国外交政策

[美] 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周桂银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

[美] 杰里尔·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朋、傅耀祖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

[美]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曹化银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3 年版。

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 1775-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韩召颖:《美国政治与对外政策》,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资中筠、陈乐民:《20 世纪的美国》,上海:三联书店 2007 年版。

七、推荐访问网站

环球网 <http://www.huanqiu.com/>

人民网 <http://world.people.com.cn/>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

中新网 <http://www.chinanews.com/world/>

美国 FP 杂志 <http://www.foreignpolicy.com/>

美国 FA 杂志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

美国智库 CFR 网站 <http://www.cfr.org/>

哈佛国际评论网站 <http://hir.harvard.edu/>

耶鲁全球在线 <http://yaleglobal.yale.edu/>

中国国关在线 <http://www.irchina.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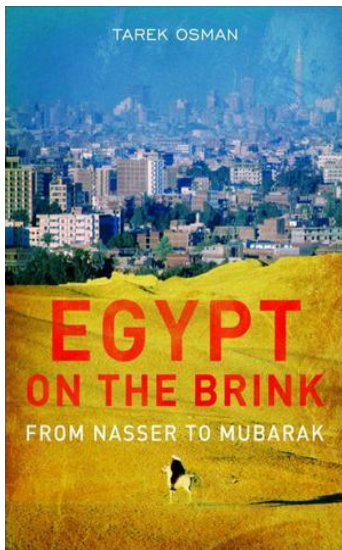
Theory Talks 网站 <http://www.theory-talks.org>

[整理:沈琳、程康、郭晓琼、于凯玥、李冰莹]

[责任编辑:沈琳]

新书架(三)

【编者按】2013年的暑假只是白驹过隙的匆匆一瞬,国际政治的舞台却风云变幻。从6月30日的“反穆”示威游行到8月14日的清场行动,埃及深陷政治泥潭、局势动荡不安。同时,叙利亚生化武器疑云全面升级,美军欲对其实施军事打击。作为学术领域中研究和争论的热点,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一直引人瞩目。本期新书架以最新时事为主题介绍相关书籍,方便读者更好地解读时事热点。



塔里克·奥斯曼:《边缘上的埃及:从纳赛尔到穆巴拉克》,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11年。(Tarek Osman, *Egypt on the Brink: From Nasser to Mubara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埃及以宗教多元化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闻名于世,但现在,埃及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一个充满镇压和分裂的土地、穆斯林兄弟会的起源地和以总统穆巴拉克为首的一个不透明的政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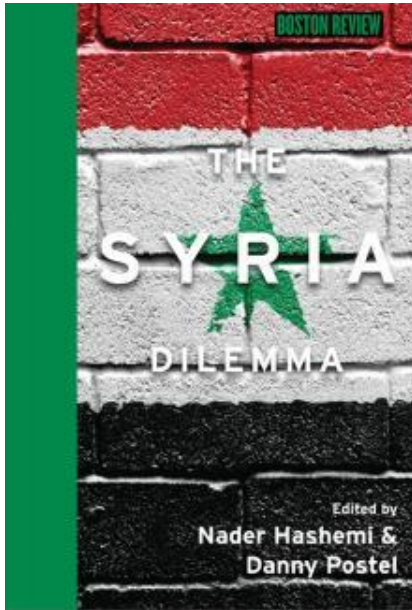
本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研究性,塔里克·奥斯曼探讨了自纳赛尔总统在1954年取得国家控制权以来,这个阿拉伯国家发生了什么。本书考察了埃及中央在两次历史性运动中发挥的角色,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激进派之间的关系,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国际化的精英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大众之间的裂痕,以及较低的就业率。本书是解读埃及和中东局势的重要指引书籍之一。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新阿拉伯起义:事件,意义和趋势》,纽约: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出版社,2011年。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The New Arab Revolt: What Happened, What It Means, and What Comes Next*,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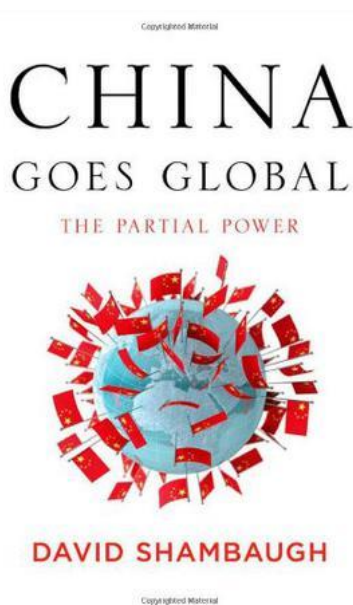
本书是一篇文章合集,收集了自2010年以来阿拉伯之春在北非蔓延的相关文章。这些文章探究了背后的原因,以及这种骚乱是如何在不同的国家扩张的,尤其是发生在埃及和利比亚的事件,并分析了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本书的文章对埃及乃至北非今年来的动乱加以整理和分析,对于系统了解中东局势有很大的帮助。



纳德·哈希米、丹尼·波斯特尔：《叙利亚的困境（波士顿评论书籍）》，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3年。（Nader Hashemi, Danny Postel, *The Syria Dilemma (Boston Review Books)*, Boston: The MIT Press, 2013.）

目前，叙利亚战争已经造成8万多人死亡，4百万人流离失所，然而情况仍在恶化。两年以来，国际社会一直未能采取行动，世界领导人多次表示决心不让暴行发生，但是伊拉克的前车之鉴，使决策者不愿提供更多军事行动。因此，本书提出，我们正面临着双重负担：一方面竭力阻止叙利亚的流血冲突，另一方面担心重蹈伊拉克的覆辙。那么，如何处理棘手的叙利亚冲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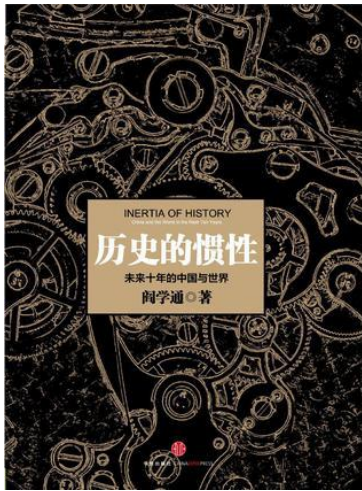
本书重点讨论了该问题的伦理和政治的困境，以及人道主义干涉的可能性。虽然本书的贡献者们——叙利亚专家、国际关系理论学家、人权活动学家和人道主义干涉学者的意见不尽一致，但他们共同代表了有价值的政治思想。《叙利亚的困境》收录了迈克尔·伊格纳蒂夫（Michael Ignatieff），玛丽·卡尔多（Mary Kaldor），托马斯·皮埃罗（Thomas Pierret），阿弗拉·加勒比（Afra Jalabi）等人的原创作品。



沈大伟：《中国走向全球》，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David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2013.）

中国的外交，中国对全球治理、贸易及投资的支持，其软实力，其军事触角，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国际化？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最杰出的中国观察家之一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试图通过采访中国及世界上的多位关键人物，并辅之以详尽的研究来回答这一问题。本书以其广度和对细节的驾驭来量度中国的国际触角。

在详尽分析中国对外政策及与主要国家、地区的关系之后，沈大伟将中国定性为一个“谨慎的外交角色”。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是“温和的修正主义者”，对二战后国际关系协调机构的运作方式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然而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中国没有兴趣处理全球治理中的问题，除非是在这些问题影响其国内利益的时候。



阎学通：《历史的惯性》，北京：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历史就是一种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过程。看透这个世界，你需要有一种历史惯性的思维。

这是一部预测10年内国际格局发展趋势的作品。未来十年，中国能否成为超级大国？东亚能否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中心？欧盟、俄罗斯、日本将风采尽失？“金砖国家”将成为历史？中国应放弃不结盟政策吗？中国应采取何种外交方式？中国的周边国家，孰敌、孰友？中国该以何种思想引领世界？

本书深刻对比、剖析了中美未来十年的实力变化，提出了2023年世界将出现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两极格局也随即形成的大胆预测，同时还将世界主要大国未来十年的发展走势进行深入阐述，探讨了两极格局形成的必然性。作者还结合国内情势以及中国政策的发展方向，提出了独到的观点以及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一个世纪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落后国家；而21世纪初叶，中国重新跻身世界主要大国行列，中华民族正释放出令国际社会惊异的伟大力量。中国如何实现这样的变化？中国的全球角色是如何生成的？中国外交如何顺应这一变化并有所作为？

本书是“创造性介入”三部曲之二。作为系列作品的第二部，本书延续了“创造性介入”的主题，探寻中国的全球角色形成的根源、阶段及走向；以中非关系为实例，探索中国外交如何对传统的不干涉内政学说做出拓展，创造性地介入国际事务；以欧洲人如何扮演全球角色为借鉴，以期从中发现对中国的启示。作者用鲜活的事例、通俗的语言及富有见地的观点，将历史与现实相交融，传统与创新相结合，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外交这个极富活力与潜力的舞台。

[供稿：刘雨晨、于凯玥、赵政]

[责任编辑：刘雨晨]

♣系内新闻♣

毕业生经验交流会

(通讯员:刘芮宁 摄影:吕海)2013年6月25日晚七点,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新视界》编辑部举办的“2013届毕业生经验交流会”在南开大学范孙楼116室举行。四位毕业生为同学们带来了一次内容翔实的经验分享交流。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的部分同学出席参加。

这次讲座主要涉及就业、考研、保研三个方面。首先与大家分享经验的是行政管理专业的宋彬彬,介绍了应聘工商银行时的经历。她为在场同学提供了银行笔试需要准备的教材和资料,同时也告诉了大家面试时需要注意的相关问题。之后,同样来自行政管理专业的杨一鹤同学介绍了备考公务员的经验。她给大家讲解了公务员考试需要准备的资料和相关应试技巧,同时也提醒大家公务员面试是高压面试,大家要保持良好的心态,端正好态度。



随后,双修国际政治专业、即将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的王

晓笛同学向大家讲述了他的考研之旅。他首先强调考研需要调整好心态,之后,他分析了考研需要准备的科目及相关应试技巧,以及复试时的经验教训,还给大家讲述了他调剂的过程。

最后,国际政治专业的姜忆楠同学为大家讲述了他的内保经历。他与在场同学分享了保研时需要注意的事项,最后他提醒大家要有好的心态,提前做好相关准备。

在互动环节,在场的同学就求职行业选择、专业对口、读研选校等关心的问题上与几位毕业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交流,为大家将来的求学和求职规划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外交部徐步司长做客“周恩来论坛”

(转自南开大学新闻网)7月5日,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副代表徐步司长做客“周恩来论坛”,为南开学子做了主题为“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及影响”的精彩演讲。演讲由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吴志成教授主持,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部分师生参加了讲座。

徐步司长以当前热门的斯诺登事件、钓鱼岛争端以及朝核问题为切入点,介绍了当前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分析了中国整体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巨大变化,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而西方世界正以复杂心态看待中国崛起。徐步司长还以外交官的亲身经历,告诫同学们要善于获取有用的知识,练就真才实学,锻造高尚品格,做到有格局、勤思考、有定力、有情商、懂感恩。

在互动环节,同学们就自己感兴趣的国际问题与徐司长继续交流,徐司长耐心细致的回答使在座的

同学们受益匪浅。徐司长的翩翩风度和渊博学识展示了当代中国外交官的魅力和风采。

林利民为南开师生做当前国际形势报告

(通讯员:李金潼)2013年7月18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博导,《现代国际关系》杂志主编林利民做客南开,为南开师生做“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的精彩讲座。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部分师生参加讲座。

林利民教授首先回顾近来国际热点问题,指出中国学者判定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国际形势是否有利于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其中中美关系、周边安全形势和世界经济形势是三个关键点,而领土领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海外利益安全问题等则是中国面临的战略危机点。他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和美国目前都面临着自身的战略机遇期,中美关系正处在“十字路口”。同时,中国必须从战略上谋划如何稳定周边安全形势,与周边国家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要善于扩大相应的政治影响力。林教授表示,中国可以通过建立周边的战略依托带,推进与美国等诸大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加强全球参与,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从而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塑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在互动环节,林利民教授就埃及政局及阿拉伯局势未来走向、中国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应和中国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等问题与同学们做了深入交流。

2013级国际政治专业介绍会

(通讯员:李安琪 摄影:左锦涛)2013年8月18日晚六点半,2013级国际政治专业介绍会在校区主楼207教室有序展开。

会议伊始,系主任韩召颖教授利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对国际政治专业作了简单的介绍,讲述了大学时代应有的生活与收获,并对同学们的新生生活提出了希冀,韩老师的谆谆教诲深入人心。随后,2013级本科生班导师刘兴华老师对韩老师的讲话进行了简单的概括,同时也提出了对同学们的祝福与希望。随后,新生分别



进行了自我介绍,同学们在热烈欢快的氛围中相互认识和熟悉。最后,到场的高年级同学也向新同学们介绍了一些学习、生活和工作方面的经验。

整个过程气氛轻松融洽。随着专业介绍会圆满结束,同学们也有了許多新的感想和收获。

♣校外短讯♣

中国人民大学

●2013年7月6日,“中国国际问题论坛2013:中国外交新动向”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中国国际问题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协办,中国17家国际问题教学与研究机构发起。本届论坛以“中国外交新动向”为主题,旨在探讨新一届领导集体执政以来中国外交的新动向。来自中共中央外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国际关系学院、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社会科学院外国问题研究所、以及美国密西西比大学、美国杰普曼大学、欧洲学院、荷兰 Leiden University、VU University Amsterdam 等国内外20余家单位的50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参加本届论坛。

●7月13日,第五轮中美韩三边战略对话会议在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召开,会议以“朝鲜半岛信任进程与东北亚和平倡议”(Korean Peninsula Trust-building Process and Northeast Asia Peace Initiative)为议题,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韩在朝鲜半岛非核化问题上的合作”以及“东北亚地区

和平与合作”三个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复旦大学

●2013年8月4日至8月8日,复旦大学国关学院本科生24人在国关学院分团委书记田元源老师的带领下,来到韩国首尔参加2013年第七届东亚政治经济学生论坛。本次活动由首尔大学主办,北京大学、东京大学、复旦大学协办,并首次邀请台湾观察员参加。该活动旨在加强东亚地区政治经济领域的学生交流。与会期间,中日韩同学建立了深切的友谊,为中日韩三国乃至东亚地区的友好交流树立了良好的示范。

清华大学

●2013年7月6日至7日,由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王雪莲教育基金资助的“2013年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第六届)”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傅莹出席年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中国智库的时代责任”的主旨演讲。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8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一千余名专家、学者和学生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次年会为期2天,共举办101场主旨论坛、圆桌会议和专题讨论。傅莹在出席7月6日年会开幕式时指出中国智库处于难得的发展机遇,她期待并相信中国智库能有大发展。傅莹强调,智库服务于外交有三个着力点:第一,智库要与决策机构建立起良性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课题需要贴近外交现实和需求;第二,智库要聚焦中国在国际问题上面临的重大课题;第三,智库要坚持自己的公共属性和社会责任,增强向中国乃至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意识和能力。

●2013年6月15-16日,由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JIP)编辑部承办的“国际合法性与大国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成功举行。英国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教授Ian Clark、国际关系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副主席、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Christian Reus-Smit、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张勇进教授、美国西北大学副教授Ian Hurd国外学者应邀提交会议论文。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小明教授、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阎学通教授、史志钦教授等国内知名学者应邀参与会议讨论。会议还吸引了来自美国、英国、印度、意大利等国家和国内北京、天津、辽宁、吉林、浙江、澳门等地高校的学者学生参与会议讨论。

北京大学

●2013年7月6日,由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和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共同主办的“国际格局新形势与两岸关系新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研讨会开幕式由台湾研究院院长李义虎教授、淡江大学副校长兼国际研究学院院长戴万钦教授共同主持并致辞。来自台湾研究院的学者与淡江大学学术访问团学者,就如何开启两岸政治对话、南海问题与两岸维权前景、台日渔业协定、中欧贸易争端、习奥会的成就与展望、台湾在拉美涉外事务、中国国内政治与两岸关系发展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探讨。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博士,于2013年6月18日上午应邀访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并与学院部分师生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圆桌讨论。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袁明教授主持了座谈会。哈斯博士首先就当今世界的基本战略形势作了简洁而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当今世界具有以下三大趋势:无极化(non-polarity)与权力的不断流散、美国的实力及领导地位仍然无可替代,以及全球化及其带来的高度流动性。这三大趋势构成了当今国际关系的大背景。哈斯博士指出,欧洲不再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地带,中东地区却仍然保持了高度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相比之下,亚洲欣欣向荣但面对上升中的民族主

义情绪。哈斯博士认为全球化时代带来越来越多的全球性挑战,而这些全球性问题与应对这些问题的全球性共识之间的鸿沟则是当今全球治理面临最大的挑战。最后,哈斯博士指出中美两国有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但是强调中美之间都面临巨大的国内挑战。

[整理: 王宝盆、彭紫嫣]

[责任编辑: 吕海]

概念辨析

结构性暴力

根据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的定义,结构性暴力指没有行为体直接施暴的暴力,相对于作为个体的行为体直接实施暴力的人身暴力或直接暴力。例如,在一个社会中,社会阶层较高的人的平均寿命高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人,尽管不存在个体直接施暴的行为,仍然可以视为是一种暴力。

资料来源:[美]阿米塔夫·阿查亚:《人的安全:概念及应用》(李佳译,陈玲、林民旺校),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整理:姜忆楠、吕海、王宝盆]

[责任编辑:姜忆楠]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2013年6月——2013年9月)

1. 田光强、韩召颖:《中国的巴基斯坦研究简述》,载《东南亚南亚研究》2013年第2期。

内容摘要:巴基斯坦在中国外交中占据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巴关系离不开中国、巴基斯坦研究者的智力支持。本文分三个阶段概述了中国、巴基斯坦研究的成果与不足。中国的巴基斯坦研究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加深了对巴基斯坦各个领域的了解。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不足:重视程度不够,研究深度以及广度仍需加强,研究力量比较薄弱。笔者建议学界加强对巴基斯坦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以改变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片面地以研究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为主的局面。

关键词: 中国; 巴基斯坦研究; 成果; 不足

作者简介: 田光强,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2级博士研究生;韩召颖,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美国外交政策、中美关系、国际安全、国际关系理论等方面的研究。

2. 刘兴华:《IMF对欧债危机的介入及其政策后果》,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内容摘要: IMF通过贷款、警告、建议、监督和引导舆论等方式参与欧债危机的国际应对。IMF敦促欧元区国家重新审视内部金融和财政制度,通过IMF提供援助的国家要求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按照IMF的指令进行政策调整。尽管支持改革者认为IMF的介入有助于增强改革合法性,但希腊等受援国的国内民众质疑IMF所扮演的角色。在地区制度建构方面,IMF对欧债危机的介入暴露了欧元区制度的问题,IMF以协调者的身份对欧元区金融制度改革提出建议,冲击了地区主导大国的影响力。在应对欧债危机的过程中,IMF实现了影响力的拓展,并试图为全球货币结构的改造寻找契机。救援资金的筹集直接影响着IMF份额改革,新兴经济体国家对援助计划提供了有力支持。当然,IMF在应对危机的方式和能力上仍有诸多局限性。

关键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欧债危机; 制度

作者简介: 刘兴华,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中国外交、国际规范、全球化与地区化、网络安全。

3. 薇薇·安·施密特、朱旭:《欧元区危机及欧盟的对策》,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内容摘要: 欧元区危机爆发后,为了降低赤字和偿还公共债务,欧盟成员国大范围削减预算。但是,由于受欧盟条约全体一致规则的束缚,欧盟行动存在内在的障碍。因此,欧盟

不仅需要寻求建立更具增长导向的经济治理模式,完善金融市场监管,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要求大国领导人发挥真正的领导力,重视成员国的正当诉求,深化欧洲经济一体化。

关键词: 欧元区危机; 欧盟经济治理; 财政整顿; 政治挑战

作者简介: 薇薇·安·施密特(Vivien Ann Schmidt), 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系教授, 欧洲研究中心主任, 欧洲一体化让·莫内讲席教授, 主要从事国际关系与欧洲政治研究; 朱旭, 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1 级博士研究生。

4. 刘丰:《国际社会应对欧债危机的经验与借鉴》, 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3 期。

内容摘要: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和发展对全球经济造成深刻影响, 应对危机并减轻其不利冲击是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债务危机通常是危机国家内部的不良财政状况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综合作用的结果, 因此危机的防范、应对与解决离不开危机国家自身的财政改革及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经济组织的救助。针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所反映出的不同层面的问题, 欧盟、欧洲央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了相应的救助措施, 并促使危机国家通过削减赤字、出售资产和重组债务等方式进行调整, 加快推进经济改革, 力图强化这些国家的危机应对能力, 实现经济增长走出危机。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及中欧关系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冲击, 中国以适当方式参与危机救助和防范也为调整中欧关系提供了契机。

关键词: 欧债危机; 危机应对; 中欧关系

作者简介: 刘丰, 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东亚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5. 徐振伟:《跨国粮商对中国粮食收购领域的渗透及影响》, 载《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3 年第 3 期。

内容摘要: 近几年来, 国外粮油巨头相继进入国内粮食市场, 介入的领域不断扩大, 速度逐年加快, 并有加速渗透的趋势, 国际粮商的压境必然会对中国粮食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其正面影响是有利于实现中国粮食市场主体的多元化, 促进粮食流通市场的发育; 其负面影响是, 国际粮商所占的市场份额逐年加大, 如成为中国市场的主导和垄断力量, 政府的粮食宏观调控将很难以奏效, 会引发我国粮食危机, 这也是最大的隐忧, 前几年外资对食用植物油的操控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关键词: 外资企业; 跨国粮商; 粮食收购; 中国粮食安全

作者简介: 徐振伟, 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美国外交、非传统安全等。

6. 吴志成、陈一一：《美国在黄岩岛与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缘何不同？》，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4期。

内容摘要：美国在中菲黄岩岛和中日钓鱼岛争端上所持基本立场存在明显差异，日、菲两国的政策立场也深受美国的影响。在黄岩岛问题上，美国立场模糊且摇摆，宣布不选边站，黄岩岛问题不适用于《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也未给菲律宾实际的军事支持；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则表现出对日本的明显偏向，不仅明确钓鱼岛问题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而且申明将保障日本的领土利益。究其原因，美国立场的差异主要是美日、美菲同盟条约的不同规定，美国对日、菲的战略目标差异以及菲律宾与日本对美国的战略影响力不同等方面因素所致。

关键词：黄岩岛争端；钓鱼岛争端；美国；美日同盟；美菲同盟；

作者简介：吴志成，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国际关系、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欧洲一体化与欧洲治理；陈一一，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2级硕士研究生。

7. 张睿壮：《国际格局变化与中国定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4期。

内容摘要：近三四年来，在舆论造势下，人们普遍相信中国已经成为国力仅次于美国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过美国的世界“老二”。然而，这种对中国实力地位的错误认定和虚妄夸大给中国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成为美国重点遏制对象；加深了周边国家对中国固有的疑虑和恐惧；陡然增加了国际社会把中国当成富国强国予取予求的压力。现如今，中国正在由弱转强，若用韬晦，还原真实国情，不做徒有虚名的“老二”，此其时也。

关键词：国际格局；中国定位；综合国力

作者简介：张睿壮，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与当代国际关系、美国外交政策与中美关系、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

8. 刘丰：《亲而离之：分化对手联盟》，载《世界知识》2013年第5期。

内容摘要：随着中国崛起速度加快，周边环境的竞争性日趋明显，中国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同盟的严重掣肘和挑战。对于面临对手联盟威胁的中国而言，分化瓦解对手联盟的历史经验与策略选择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在继续坚持不结盟战略的前提下，至少有两方面选择：一是根据不同议题领域的性质寻找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结成宽泛的议题联合；二是通过与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利益关联，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影响它们的厉害判断，从而使他们继续奉行对华友好政策。

关键词：分化联盟；不结盟政策；议题联合；利益关联；周边环境

作者简介：刘丰，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东亚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9. 赵龙跃、李家胜：《美国战略东移的经济方略：内涵与应对》，载《太平洋学报》2013年第6期。

内容摘要：近年来，美国战略东移的意图与行动逐渐明显，战略东移并非仅致力于政治与军事领域，经济领域也成为其主要内容。然而学界的研究中，关于美国经济战略东移的研究非常有限。在当前世界经济重心整体东移的背景下，有必要考察美国战略东移中的经济方略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美国；战略东移；经济方略；RCEP；TPP

作者简介：赵龙跃，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关系、全球经济治理、WTO与国际经济谈判、中美经贸关系等；李家胜，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2级硕士研究生。

10. 吴志成、何睿：《全球有效治理缘何如此艰难？》，载《当代世界》2013年第7期。

内容摘要：新世纪以来，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全球治理在很多领域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全球化负面效应的凸显，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失灵的担忧。考察全球治理的艰难历程，政治多极化趋势、经济发展失衡、全球治理主体的利益分歧、现有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危机、国际议题与国内政治界限的模糊等因素均制约着全球治理的作用与效果。

关键词：全球治理；全球化进程；合法性危机；发展失衡；治理失灵

作者简介：吴志成，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国际关系、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欧洲一体化与欧洲治理等；何睿，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2级博士研究生。

国际关系中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

1. 刘江永：《国际格局演变与中国周边安全》，第4-24页。
2. 祁怀高、石源华：《中国的周边安全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第25-46页。
3. 田野：《贸易自由化、国内否决者与国际贸易体系的法律化——美国贸易政治的国际逻辑》，第47-76页。
4. 徐秀军：《制度非中性与金砖国家合作》，第77-96页。
5. 汤伟：《世界城市与全球治理的逻辑构建及其意义》，第97-116页。
6. 康晓：《国际规范的双重属性与规范的缘起——基于国际气候合作规范的分析》，第117-135页。
7. 罗杭、孟庆国：《安理会改革与大国博弈的多智能体模拟》，第136-155页。

《当代亚太》2013年第4期

1. 王树春、万青松:《论新型中俄关系的未来走向:结伴还是结盟?》,第4-22页。
2. [印]思瑞坎:《印度对华对冲战略分析》,第23-53页。
3. 曾向红:《美国参与中亚事务的主要途径及其效果研究》,第54-84页。
4. 聂文娟:《东盟如何在南海问题上“反领导”了中国?——一种弱者的实践策略分析》,第85-106页。
5. 李德霞:《菲律宾主流英文媒体对黄岩岛事件的报道分析——以〈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为例》,第107-136页。
6. 曲波:《条约视角下的钓鱼岛主权归属探究》,第138-153页。

《外交评论》2013年第4期

1. 张清敏:《中国解决陆地边界经验对解决海洋边界的启示》,第1-16页。
2. 黄世席:《钓鱼岛主权归属与条约法的适用》,第17-29页。
3. 郑志华:《中国南海U型线地图的可采性与证明力》,第30-44页。
4. 莫盛凯:《中国公共外交之理论与实践刍议》,第45-56页。
5. 贺建涛:《中等强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地位边缘化的根源——以加拿大为例》,第57-70页。
6. 李因才:《跨国技术援助与国家能力建设》,第71-83页。
7. 聂文娟:《大国因素与地区安全机制的制度化——以东盟与非盟的地区安全机制为例》,第71-95页。
8. 孙逊:《奥巴马政府国家反恐战略评析》,第96-107页。
9. 史文涛:《现代版的“西西里远征”:摩根索对越南战争的批判》,第108-127页。
10. 马骏:《国际制度的次优选择:从有限理性到不确定性》,第128-142页。
11. 孙建宏、郑义炜:《国际组织研究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初探》,第143-154页。
12. 张平:《“中国外交的新起点”高端论坛综述》,第155-156页。

《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7期

1. 王明国:《中美科技合作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第1-8页。
2. 蔡鹏鸿:《亚太区域架构变动的现状与前景》,第9-13页。
3. 赵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第14-22页。
4. 孙茹:《奥巴马政府对朝“战略忍耐”与朝核问题》,第23-29页。
5. 冯峰:《“普世价值”与美国全球战略》,第30-34页。
6. 刘明礼:《试析欧元区的困境与前景》,第35-40页。
7. 王生、罗肖:《构建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与路径》,第41-49页。

8. 王辉:《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战略回应》,第50-55页。
9. 阿地力江·阿布来提:《境外“疆独”势力对新疆的网络渗透及其危害》,第56-62页。
10. 杨昊:《全球首届“全球学与全球治理论坛”综述》,第63页。

《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

1. 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第1-7页。
2. 陈晓东:《继往开来——共创中阿关系美好未来》,第8-13页。
3. 杨福昌:《中阿关系的历史和现实》,第13-16页。
4. 萨凯乐:《阿拉伯巨变与中阿合作》,第16-19页。
5. 阮宗泽:《赢得下一个十年:中国塑造多支点外交》,第20-36页。
6. 叶皓:《对深化经济外交的若干思考》,第37-43页。
7. 俞新天:《中国价值观的世界意义》,第44-56页。
8. 庞中英、王瑞平:《全球治理:中国的战略应对》,第57-68页。
9. 赵隆:《从渔业问题看北极治理的困境与路径》,第69-82页。
10. 柳莉:《叙利亚危机与中东格局演变》,第83-93页。
11. 曹群:《南海争端与国际仲裁:菲律宾之妄诉》,第94-112页。
12. 赵鸿雁、刘超:《俄罗斯公共外交的传播瓶颈与未来发展路劲》,第113-127页。
13. 杨建超、赵磊:《美国社会化媒体外交评析》,第128-139页。

《美国研究》2013年第1期

1. 孙哲、徐洪峰:《奥巴马政府战略重心东移对美俄关系的影响》,第9-21页。
2. 刘子奎:《论冷战后的美国防扩散政策》,第22-44页。
3. 赵可金:《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中美关系:话语权的视角》,第45-64页。
4. 陈力:《美国的南极政策与法律》,第65-86页。
5. 舒建中:《美国对外能源政策与国际能源机构的建立》,第87-101页。
6. 曲升:《美国航行自由计划初探》,第102-116页。
7. 翟涛:《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宣传政策的演变:1949-1964》,第117-137页。
8. 赵明昊:《权利与规则并非敌人——〈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与转型〉读后感》,第138-144页。
9. 池志培:《帝国危机:浅论美国学者对反恐战争的反思》,第145页。

《欧洲研究》2013年第4期

1. 王玉柱:《欧元区通胀差异及对经济失衡的影响》,第1-18页。
2. 张晓通等:《欧日自由贸易区谈判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第19-37页。

3. 洪邮生:《欧洲国际关系演进的现实逻辑和价值取向刍议》,第38-56页。
4. 吕蕊:《和解政治与联邦德国-以色列建交》,第58-71页。
5. 富景筠:《新区域主义视角下俄罗斯区域合作战略演变的多维互动分析》,第73-87页。
6. 李尧:《试析欧盟成员国对北约和CSDP态度的变化》,第89-107页。
7. 刘衡:《论欧盟关于后2020全球气候协议的基本设计》,第108-123页。
8. 李仁真、杨心怡:《欧洲稳定机制的法律透视》,第124-137页。
9. 叶隽:《制度欧盟与文化欧洲的悖论》,第138-151页。
10. 宋晓敏:《希腊萨马拉斯总理演讲综述》,第152页。

《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2期

1. 曹金绪:《实力与决心的较量:三方不对称军事威慑博弈分析》,第1-34页。
2. 吴宇:《北约成员对美防区外战争的反应》,第35-61页。
3. 曹玮、赵可金:《合法性塑造及中国公共外交》,第62-93页。
4. 张伟玉、陈哲、袁娜莉:《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兼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第94-120页。
5. 沃德·沃姆丹姆:《中国外援的自由国际主义性质》,第121-155页。

国际关系英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7, No. 3

1. Joanne Gowa and Raymond Hicks, "Politics, Institutions, and Trade: Lessons of the Interwar Era," pp. 439-467.
2. Yonatan Lupu, "Best Evidence: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in Domestic Judicial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greements," pp. 469-503.
3. Dongwook Kim,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pp. 505-539.
4. Amanda Murdie and Alexander Hicks, "Can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Boost Government Services? The Case of Health," pp. 541-573.
5. Ahsan I. Butt, "Anarchy and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amining South America's War-Prone Decade, 1932-41," pp. 575-607.
6. David E. Cunningham and Douglas Lemke, "Combining Civil and Interstate Wars," pp. 609-627.
7. Krzysztof J. Pelc, "Googling the WTO: What Search-Engine Data Tell Us Abou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s," pp. 629-655.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7, No. 3

1. Arindrajit Dube, Oeindrila Dube and Omar Garc á-Ponce, “Cross-Border Spillover: U.S. Gun Laws and Violence in Mexico,” pp. 397-417.
2. Sarah Elizabeth Parkinson, “Organizing Rebellion: Rethinking High-Risk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Networks in War,” pp. 418-432.
3. Marcus Agnafors, “Quality of Government: Toward a More Complex Definition,” pp. 433-445.
4. Janet M. Box-steffensmeier, Dino P. Christenson and Matthew P. Hitt, “Quality Over Quantity: Amici Influence and Judicial Decision Making,” pp. 446-460.
5. Darakay Cohen, “Explaining Rape during Civil War: Cross-National Evidence (1980–2009),” pp. 461-477.
6. Robert E. Goodin, “Disgorging the Fruits of Historical Wrongdoing,” pp. 478-491.
7. Henry A. Kim and Brad L. Leveck, “Money, Reputation, and Incumbency in U.S. House Elections, or Why Marginals Have Become More Expensive,” pp. 492-504.
8. Ben Ansell and Johannes Lindvall,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Primary Education Systems: Ideology, Institutions, and Interdenominational Conflict in an Era of Nation-Building,” pp. 505-522.
9. Andrew F. March, “Rethinking Religious Reasons in Public Justification,” pp. 523-539.
10. Andrew Beath, Fotini Christia and Ruben Enikolopov, “Empowering Women through Development Aid: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Afghanistan,” pp. 540-557.
11. Cyrus Samii, “Perils or Promise of Ethnic Integration? Evidence from a Hard Case in Burundi,” pp. 558-573.
12. Mark R Beissinger, “The Semblanc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Coalitions in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pp. 574-592.
13. Robert S. Taylor, “Market Freedom as Antipower,” pp. 593-602.
14. K. Kivanç Karaman and Sevket Pamuk, “Different Paths to the Modern State in Europ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arfar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Regime,” pp. 603–626.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3

1. Tim Dunne, Lene Hansen, and Colin Wight,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405-425.

2. 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 Walt, "Leaving theory behind: Why simplistic hypothesis testing is bad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427-457.
3. Andrew Bennett, "The mother of all isms: Causal mechanisms and structured plur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459-481.
4. Chris Brown, "The poverty of Grand Theory," pp. 483-497.
5. Charlotte Epstein, "Constructivism or the eternal return of universa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y returning to language is vital to prolonging the owl's flight," pp. 499-519.
6. Stefano Guzzini, "The en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Stages of reflexivity and modes of theorizing," pp. 521-541.
7.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and Daniel H. Nexon,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aradigmatic era: From substantive wagers to scientific ontologies," pp. 543-565.
8. David A. Lake, "Theory is dead, long live theory: The end of the Great Debates and the rise of eclectic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567-587.
9. Christian Reus-Smit, "Beyond metatheory?" pp. 589-608.
10. Christine Sylvester, "Experiencing the end and afterliv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ory," pp. 609-626.
11. Arlene B. Tickner, "Core, periphery and (neo)imperial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627-646.
12. Michael C. Williams, "In the begin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lightenment and the en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647-665.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8, No. 1

1. Keren Yarhi-Mi,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How Leaders and Intelligence Communities Assess the Intentions of Adversaries," pp. 7-51.
2. Daniel W. Drezner, "Military Primacy Doesn't Pay (Nearly As Much As You Think)," pp. 52-79.
3. Keir A. Lieber, Daryl G. Press, "Why States Won't Give Nuclear Weapons to Terrorists," pp. 80-104.
4. Alan J. Kuperman, "A Model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Reassessing NATO's Libya Campaign," pp. 105-135.
5. Aidan Hehir, "The Permanence of Inconsistency: Libya,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pp. 137-159.
6. Davis Brown, Michael L. Gross, Tamar Meisels, Jerome Slater, "Just War Theory

and the 2008–09 Gaza Invasion,” pp. 160-173.

7. Paul R. Pillar, Robert Reardon, James K. Sebenius, Michael K. Singh, “Nuclear Negotiations with Iran,” pp. 174-192.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7, No. 3

1. Harvey Starr, “On Geopolitics: Spaces and Places,” pp. 433-439.
2. Nathan M. Jensen, “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the Taxing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pp. 440-448.
3. Laron K. Williams, “Flexible Election Timing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p. 449-461.
4. Shahar Hameiri and Lee Jones, “The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pp. 462-473.
5. Emilie Hafner-Burton and James Ron, “The Latin Bias: Regions, the Anglo-American Media, and Human Rights,” pp. 474-491.
6. Charles r. Hankla and Daniel Kuthy, “Economic Liberalism in Illiberal Regimes: Authoritarian Variatio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p. 492-504.
7. Philip B. K. Potter, “Electoral Margin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 505-515.
8. Tanya Bagashka and Randall W. Stone, “Risky Signals: The Political Costs of Exchange Rate Policy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pp. 519-531.
9. Colin M. Barry, K. Chad Clay and Michael E. Flynn, “Avoiding the Spotlight: Human Rights Shaming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p. 532-544.
10. Joe Clare, “The Deterrent Value of Democratic Allies,” pp. 545-555.
11. William R. Clark, Sona N. Golder and Paul Poast, “Monetary Institutions and the Political Survival of Democratic Leaders,” pp. 556-567.
12. Monika Bauhr, Nicholas Charron and Naghmeh Nasiritousi, “Does Corruption Cause Aid Fatigue? Public Opinion and the Aid-Corruption Paradox,” pp. 568-579.
13. Toby J. Rider “Uncertainty, Salient Stakes, and the Causes of Conventional Arms Races,” pp. 580-591.
14. Edward D. Mansfield and Jon C.W. Pevehouse, “The Expansion of 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s,” pp. 592-604.
15. Katja B. Kleinberg and Benjamin O. Fordham,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Trade and Conflict,” pp. 605–619.
16.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620-634.

17. Christopher Chase-Dunn, "Response to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635-636.
18. Paul Musgrave and Daniel H. Nexon, "Singularity or Aberration? A Response to Buzan and Lawson," pp. 637-639.
19. Andrew Phillips, "From Global Transformation to Big Bang—A Response to Buzan and Lawson," pp. 640-642.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7, No. 5

1. Paul Poast, "Can Issue Linkage Improve Treaty Credibility?: Buffer State Alliances as a 'Hard Case'," pp. 739-764.
2. Milan W. Svobik, "Contracting on Violence: The Moral Hazard in Authoritarian Repression and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Politics," pp. 765-794.
3. Seden Akcinaroglu and Elizabeth Radziszewski,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Opportunities, and Termination of Civil Wars in Africa," pp. 795-821.
4. Dawn Brancati and Jack L. Snyder, "Time to Kill: The Impact of Election Timing on Postconflict Stability," pp. 822-853.
5. Simon A. Mettler and Dan Reiter, "Ballistic Missile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p. 854-880.
6. Mario Ferrero, "The Cult of Martyrs," pp. 881-904.
7. Michael G. Findley, "Bargaining and the Interdependent Stages of Civil War Resolution," pp. 905-932.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0, No. 4

1. Nitsan Chorev, "Restructuring neoliberalism at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p. 627-666.
2. Patrick Sharma, "Bureaucratic imperatives and policy outcomes: The origins of World Bank structural adjustment lending," pp. 667-686.
3. Ulrich Brand & Markus Wissen, "Crisis and continuity of capitalist society-nature relationships: The imperial mode of living and the limits to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p. 687-711.
4. Antoni Verger & Barbara van Paassen, "Human development vis-à-vis free trade: Understand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positions in trade negotiations on educ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p. 712-739.

5. David Fields & Matías Vernengo, “Hegemonic currencies during the crisis: The dollar versus the euro in a Cartalist perspective,” pp. 740-759.
6. Thomas Richter, “When do autocracies start to liberalize foreign trade? Evidence from four cas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pp. 760-787.
7. Bartholomew Paudyn, “Credit rating agencies and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Performing the politics of creditworthiness through risk and uncertainty,” pp. 788-818.
8. Valbona Muzaka,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European ‘competitiveness’,” pp. 819-847.
9. Thomas B. Pepinsky,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financial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pp.848-880.
10. Christopher Gandrud, “The diffusion of financial supervisory governance ideas,” pp. 881-916.
11. Stephen Robert Buzdugan, “Regionalism from without: External involvement of the EU in regionalism in southern Africa,” pp. 917-946.
12. Samuel Rueckert Brazys, “Evidencing donor heterogeneity in Aid for Trade,” pp. 947-978.
13. Liviu Voinea, “Revisiting crisis generators in Romania and other new EU member states,” pp. 979-1008.

Security Studies, Vol. 22, No. 3

1. Jon R. Lindsay, “Stuxnet and the Limits of Cyber Warfare,” pp. 365-404.
2. Keren Yarhi-Milo, “Tying Hands Behind Closed Doors: The Logic and Practice of Secret Reassurance,” pp. 405-435.
3. Eric J. Hamilton & Brian C. Rathbun, “Scarce Differences: Toward a Material and Systemic Foundation for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Realism,” pp. 436-465.
4. Assaf Moghadam, “How Al Qaeda Innovates,” pp. 466-497.
5. Yasuhiro Izumikawa, “To Coerce or Reward? Theorizing Wedge Strategies in Alliance Politics,” pp. 498-531.
6. Marc R. Devore, “Arms Production in the Global Village: Options for Adapting to Defense-Industrial Globalization,” pp. 532-572.

World Politics, Vol. 65, No. 3

1. Dara Kay Cohen, “Female Combatants and the Perpetration of Violence: Wartime

- Rape in the Sierra Leone Civil War,” pp. 383-415.
2. Thomas Paster, “Business and Welfare State Development: Why Did Employers Accept Social Reforms?” pp. 416-451.
 3. Christina J. Schneider, “Globalizing Electoral Politics: Political Competence and Distributional Bargain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pp. 452-490.
 4. Antje Ellermann, “When Can Liberal States Avoid Unwanted Immigration? Self-Limited Sovereignty and Guest Worker Recruitment in Switzerland and Germany,” pp. 491-538.
 5. Johannes Lindvall, “Union Density and Political Strikes Union Density and Political Strikes,” pp. 539-569.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9, No. 3

1. L. H. M. Ling, “Worlds beyond Westphalia: Daoist dialectics and the ‘China threat’,” pp. 549-568.
2. Justin Rosenberg, “The ‘Philosophical Premises’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pp. 569-597.
3. Ruth Blakeley, “Human Rights, State Wrongs, and Social Chang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mancipation,” pp. 599-619.
4. Peter Ives and Nicola Short, “On Gramsci and the International: a Textual Analysis,” pp. 621-642.
5. Erika Cudworth and Stephen Hobden, “Complexity, Ecologism, and Posthuman Politics,” pp. 643-664.
6. Katherine Allison, “American Occidentalism and the agential Muslim Woman,” pp. 665-684.
7. Stefan A. Schirm, “Global Politics are Domestic Politics: a Societal Approach to Divergence in the G20,” pp. 685-706.
8. Peter Harris, “Decolonising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Diego Garcia, the Chagossians, an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pp. 707-727.
9. Mattias Vermeiren, “Monetary Power and EMU: Macroeconomic Adjustment and Autonomy in the Eurozone,” pp. 729-761.
10. Carl Death, “Governmentality at the Limits of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Politics and Foucauldian Theory,” pp. 763-787.

[整理: 赵姝婧、李家胜、石宇]

[责任编辑: 石宇]

读编往来

【编者按】新学年又开始了。南开国关迎来了2013级的新生力量，也送别了一批依依不舍的国关人。遇见在国关，可能不全是惊喜，也会遭遇困惑与迷惘；启程于国关，或许今后聚散天涯，但那颗关爱国关的心依旧炽热。本期读编往来的读者来信，恰好暗合了这个特殊的时节，在此与诸君共享。



邓丽瑶（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告系2012级本科生）：我们本身就处于信息巨量生产和高速传播的信息爆炸时代，透过《新视界》，我很高兴撷取出一抹抹精华来提升自己。

学术论文、学人访谈、英采飞扬等模块是一场场头脑风暴后呈现的“拟态环境”，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再现，而是传播者通过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经过自我思考而得出的基于事实上的感悟虽然不能原汁原味的还原事实，但也提供了读者重新解读事实的角度和方法。加上额外的小知识和链接补充，确实让我受益颇丰。但有时也深感读来无味，如能从同学们关注的事件出发，以小见大，一步步扩展开，趣味性就能增强了。

建议《新视界》应该更加注重跨学科的交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也能发现政治和传播间的联系，很多解读用到的理论都是互通的，《新视界》的素材源于生活，自然有值得思考之处，这也需要我们读者自觉的努力。

作为一名读者，我还希望它的目光更加新奇和锐意。

在全球化背景下，微观的信息压力——群体中的多数意见对成员中的个人或少

数意见所产生的压力——也于无形中压迫人们的神经，使之成为“沉默的螺旋”。《新视界》既然是学生自办刊物，就要为同学们说话，为监督提供一个清醒的平台，面对各类事物，都需要自己真实而独到的看法，不流于形式，不屈服于权威，更不能作为别人的唇舌。这种态度是我们从生活和学习中渐渐聚集的积淀。这才是国际政治系的学生应有的风度和姿态！

希望《新视界》能在编者与读者间真正架起一座桥梁，造就一个更加美丽的新视界！

小编：丽瑶同学，你好！首先感谢你的来信，感谢你从新闻传播学科为大家带来的全新视野，的确使我们耳目一新。关于《新视界》应该更加注重跨学科交流，其实，我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例如，在编辑年终时事盘点和英采飞扬等栏目时，我们会面向全国高校师生广发英雄帖，邀请他们参与到我们的编辑和讨论中来。此外，《新视界》作为一本原创的学生刊物，主要由南开国政系的各级师生自采自编。在一代代编者的努力之下，刊物的质量水平处在稳步提升之中，我们会争取不断创新，尽力为读者提供更好的《新视界》。当然，《新视界》作为一本纯粹的学生刊物，本身并不负责舆论引导，也就基本不存在

“面对各类事物，流于形式、屈服于权威、作为别人的唇舌”之说了。因为，《新视界》所致力宗旨就是为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服务，为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便利。对于这一点，相信你认真看几期《新视界》就不难体会到了。

最后，也希望你和所有关心、关爱《新视界》的朋友们保持住你们的热情，与《新视界》一道成长，共同进步！

皮敏维（原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2012级本科生，现已转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想来大一没上课之前，就看到了学长辛苦送过来的系刊——《新视界》。《新视界》给了我一个窗口去观察、了解国际关系这个专业以及南开的国际关系学科。规范深刻的论文，精辟全面的时事观察，著名学者的专栏介绍……这都不断吸引我走进国际政治这个学科，同时也让我提前了解了相关知识。

当然，我觉得系刊也有所不足。从新生的角度而言，系刊缺乏基础理论知识的引导，建议把新书架减一些，加些“旧书架”，用来介绍和讲解一些国际关系的基础或者经典理论。同时，我觉得，国际关系这门学科与政治学、世界历史等学科分不开，相关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历史也可以适当介绍，拓宽学科视野，同时也可以提高新生的阅读兴趣。

此外，像“海外之旅”版块，我觉得可以适当增加一些大家都关心的比如出国、考研、海外高校和前沿国关理论等方面的内容。关于学术论文这个版块，系刊的论文很好，但希望除了论文之外，还可

以加一些论文简评、国际关系论研究方法介绍等内容，以便更好更深地帮助读者进行批判性阅读，真正达到增加读者理论修养的效果。

虽然已经不在国际关系系学习，但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学科，也希望咱们的系刊越办越好。

小编：敏维同学，你好！首先感谢你的来信，也感谢你的意见和祝福。你关于“旧书架”的提议很好，对于这点我们会请相关负责同学考虑。其次，你能够注意到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关系，看得出你很用心地阅读了系刊，这一点咱们的编辑们也都在努力，会力争更大地拓宽同学们的“视界”。关于海外之旅这个栏目，我想你应该是更多地看到了去年的夏季号，这个栏目并不是每期都有的，那一期有“海上大学”专栏，所以对海外游记的着墨多些，咱们一年四期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出国、考研和海外高校在每一期系刊中都陆续会有涉及的。此外，书评不会每期都有，视稿件情况而定，也欢迎你身边的同学踊跃投稿，毕竟，《新视界》是国际关系系全体的系刊，只有在大家的呵护下才能真正茁壮成长。至于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方法，建议你可以多多关注他山之石栏目，上面不仅有国际关系学科的学习方法，还有课程教学、论文写作等方面的实用经验。最后，祝你在新的专业学习顺利！南开国关将永远做你的精神家园。

[整理：王芳琳、孙迪]

[责任编辑：胡阳阳]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一、总 则

1. 正文注释采用页下注(脚注), 每页依序重新编号。
2. 注释格式: 中文字体为宋体, 英文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 字号小五, 单倍行距。
3. 学位论文后必须列出“参考文献”, 课程论文一般不做要求。
4. 所引资料务必真实、准确、规范。

二、中文注释

(一) 著作

1. 专著: 著者, 文献名, 卷册序号, 出版地,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页码。若出版机构名称已包含地名, 不必重复注出。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 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201 页。

2. 编著: 应在编者姓名后加“编”或“主编”、“编著”。

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60-68 页。

3. 译著: 在著者姓名前可以“[]”标明著者国别; 在文献名之后, 可标明译者。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六章”。

4. 如著者、编者为二人, 两者姓名之间以顿号间隔; 如为三人以上, 可省略为“×××(第一责任者姓名)等(编)”。

宇燕、盛洪:《旧邦新命》, 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第 146、158 页。

吴志成、薛晓源主编:《欧洲研究前沿报告》,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陈志瑞等主编:《开放的国际社会: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学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49 页。

(二) 文章

1. 文集论文: 著者, 文章题目(加书名号), 文集编者名称, 文集名, 出版地、出版单位及版次, 页码。

[美]威廉·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 载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99-117 页。

2. 期刊论文

张睿壮:《“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109-117页。

3. 会议论文

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全球化与亚太区域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6月15-17日,第3页。

4. 学位论文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论文,1999年4月,第55页。

(三) 其他

如引用资料来自政府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标明编辑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辑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例如: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页。

《中国与八国财长就全球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对话》,新华社莫斯科2006年2月1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研究室:《中国外交——2006年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560页。

三、外文注释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的释出,可参照相应文献释出的通约惯例。

(一) 著作

专著:著者,文献名(斜体),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页码。著作者姓名以名前姓后的顺序书写。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18.

如为编著,则编者姓名后加“ed.”(编者为一入)或“eds.”(编者为二人以上)。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Chapter 3.

如著作者为三人以上,第一责任者姓名之后可省略为“et al.”(意即 and others)。例如:

Judith L. Goldstein, et al., *Leg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1, p. 160.

Walter Carlsnaes, et al.,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pp. 354-355.

(二) 文章

1. 文集论文: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文集编者,文集名称(斜体),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页码。

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97, p. 169.

2. 期刊论文: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刊物名称(斜体),刊物出版卷次、期号及年份,页码。例如:

Robert Jervis, “Unipolarity: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January 2009, pp. 188-213.

3. 报纸文章: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报纸名称(斜体)及具体出版日期,如能注明版面更好。

Joseph S. Nye Jr., “Lessons in Imperialism,” *Financial Times*, June 17, 2002.

4. 会议论文

David Shambaugh, “The Evolving Asian System: A New Regional Struct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 and Sino-U.S. Relations”, Beijing, China, November 3-4, 2005.

5. 学位论文

Ruizhuang Zha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otives: National Interest vs. Ideolog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7, p. 9.

(三) 其他

如引用政府或国际组织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标明编辑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辑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

Daniel Landau,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ilitary Expenditur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13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3, p. 55.

四、重复引用和转引

(一) 重复引用

如重复引用同一文献, 不论中外文, 只需注明著作者、文献名和页码。

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 第 101 页。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12-113.

(二) 转引

1. 中文文献

先将转引文献按上述注释方式释出, 以句号结束。再以“转引自”把载有转引文献的来源文献按相应方式释出。

[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 体系、过程与政策》(曹沛霖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232 页。转引自胡鞍钢:《中国崛起之路》,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181 页。

2. 外文文献

Hans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p. 194. Quoted in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 p. 19.

五、互联网资料

使用互联网资料时, 著作者、文献名称等类项同上述相应体例, 同时注明详细网址和访问时间。

《中美联合声明》, 新华网, 2009 年 11 月 17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7/content_12475620.htm (最后访问时间: 2009 年 12 月 10 日)。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http://www.dni.gov/nic/PDF_2025/2025_Global_Trends_Final_Report.pdf (最后访问时间: 2009 年 12 月 14 日)。

六、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供制作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时参考。

(一) 中文部分

中文参考文献的书写体例同中文注释体例，文献排序规则如下：

1. 中文作者按照姓氏拼音排列；
2. 译著按照作者中译名顺序排列。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以专著、编著、论文为类依次排列，同一类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期刊和文集集中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1.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3. 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8 年版。
4.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5.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第 165-176 页。
6.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

(二) 外文部分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的，可参照相应文献的通约惯例。书写体例如下：

1. 第一著作者姓名以姓前名后的顺序书写，姓名以逗号间隔；
2. 以第一著作者英文姓氏顺序排列，首行缩进 2 字符；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以专著、编著、论文为类依次排列，同一类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同一作者姓名多次出现以“——”代替；
5. 期刊和文集集中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 Doyle, Michael W. 1983.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art II."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4): 323-353.

———. 1986.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4): 1151-1169.

Elman, Coli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2001. *Bridges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Keohane, Robert O. ed. 1986.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enneth N. 1967.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1): 4-41.

———. 2002. “Intimations of Multipolarity.” in Birthe Hansen and Bertel Heurlin eds. *The New World Order: Contrasting Theories*. London: Macmillan. pp. 1-18.

征稿启事

《新视界》(季刊)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管,国际关系系学生自筹自办、倡导学术性和生活性相结合的学生刊物。本刊秉承“知识性、交流性、原创性”原则,以“我的视界我做主”为理念,旨在为师生搭建交流的平台、营造学术的争鸣氛围,为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助力。“立足于南开,但又不限于南开”,我们热忱欢迎校内外和国内外学人和同学惠赐佳作。

本刊主要有学人访谈、学术论文、书山有路、国关人物、他山之石、新书架、英采飞扬等固定栏目。另外,根据学科发展及国际形势变化,本刊还适时增设论文工作坊、学界动态、聚焦、笔谈等浮动栏目。本刊欢迎学术性论文(包括书评),国内外国际关系学者访谈、学术历程介绍及轶事,新书评介及学术动态等方面的稿件。来稿正文字数在 10000 字以内为宜。

投稿须知:

1. 本刊来稿一律要求原创首发,文责自负,反对剽窃、抄袭等一切学术不端行为(由于本刊**内部发行**,**不影响**作者**转投**其他公开性学术刊物)。本刊将竭诚为作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交流平台。
2. 来稿需为 Word 文档格式,注释采用脚注,格式参阅本刊附录《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投稿请作者把稿件电子版以附件形式发至本刊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并请提供 200 字以内作者基本信息(姓名,性别,教育背景,单位,职称,邮箱,电话,通信地址等)。
3. 首次涉及的外国人民、地名、机构名及其他专有名词,中译名请参照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并在中译名后括号内注明原文。
4. 所有学术性来稿采取双向匿名审稿制度,将在一个月内审读来稿并告知作者是否采用。对拟采用的稿件,编辑部将请作者根据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并在出刊后向作者寄送该刊物两本。另外,本刊根据栏目需要有权对来稿酌情删改,如不同意请在来稿中注明。
5. 编辑部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中国天津市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300071)

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nkirnewvision>

主页: <http://nknewvision.yolasite.com/>

New Vision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主管
《新视界》编辑部 主办